

中國文化研究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18 年第 2 期

总第 6 期

主办

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常江

主编

李浩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杭

责任编辑

陈战峰 任雅芳

胡永杰 刘晓宇

孟飞 陈艳

封面题字

袁行霈

◆工作动态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 2018 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 / 2

中心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 / 3

中心召开“马工程”配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定稿会 / 4

中心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合召开“清编《全唐文》校笺”项目审订推进会 / 5

◆活动综述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文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6

◆专家观点

李旻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 11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 38

◆学者风采

社科名家——彭树智 / 42

◆新书推介

《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 / 44

《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 / 4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 2018 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

2018 年 4 月 6 日至 7 日,由西北大学承办,我中心负责筹办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 2018 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安举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科委和教指委部分委员以及特邀专家学者近 30 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上,常江副校长代表西北大学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段建军教授,原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先后做主题发言。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福贵教授传达了教育部《编制学科发展状况报告》等相关文件,学者们就文件内容及精神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会议研讨主要涉及新时代及党的十九大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文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中文学科教育应增强学术理性,坚守学术伦理等重大议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2018年度工作会议

2018年4月 中国·西安



中心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

2018年5月9日,以西北大学为牵头单位,郭立宏校长为牵头人,我中心负责实施的省级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来自陕西省政府、省教育厅及省内各高校、研究机构共40余位相关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邓理同志、省政府学位委员会秘书长袁宁同志、西北大学副校长常江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共同为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揭牌仪式后,与会专家就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的意义和所担当的责任,中心的实施方案及工作思路,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心如何呼应、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中心的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专家们一致认为,“协同创新中心”成立是顺应陕西省及全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新时代要求的重大举措,虽然它在面对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种种挑战,但必将推动陕西省文化研究及建设事业更好地发展,拥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心召开“马工程”配套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定稿会

2018年5月12日,由我中心筹办“马工程”教材《中国文学史》配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定稿会在西安召开。教材评审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编审、山东大学孙之梅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教授、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文献》主编张廷银编审、陕西师范大学周淑平教授、西北大学郝润华教授、赵小刚教授、三秦出版社高峰编审,出版方代表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事业部迟宝东主任、刘纯鹏编审,教材主编李浩教授、分卷主编李芳民教授、张文利教授,教材编写组成员及中心相关人员等20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主任李浩教授主持。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事业部迟宝东主任介绍了国家对“马工程”教材高度重视的情况和出版社对本教材的期待。西北大学教务处李剑利处长表达了学校对本教材的重视和对其即将出版的祝贺。李浩教授、李芳民教授、张文利教授分别介绍了全书及各分卷的编写情况。评审专家首先肯定了教材在作品选目、注释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既表现出了编者自身的学术特色,又能符合新时代教学和教育要求。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教材在文本校勘的精审、注释的准确,体例的统一等方面尚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的修改提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中心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合召开 “清编《全唐文》校笺”项目审订推进会

2018年6月9日,中心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合召开的“清编《全唐文》校笺”项目审订推进会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举行,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薛保勤先生、中心主任李浩教授、文学院郝润华教授,出版社马来社长、张萍总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郭文灏先生、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朱兆虎主任、马婧编审、许庆江编审及课题组成员、编辑组成员近30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清编《全唐文》校笺”系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的重大项目,由出版社与中心负责申

报,陈尚君教授、李浩教授、郝润华教授担任主编,国内近30位学者参加,西北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经过四年的艰苦工作,目前已近完成。会议由李浩教授和张萍总编辑主持,郝润华教授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成员就工作中遇到和存在的问题交流了看法,陈尚君教授等对相关问题的改进提出了要求和意见。

经过讨论交流,课题组成员对工作体例、相关问题的修改等提高了认识,统一了看法,并对近期较高质量地完成课题初稿充满期待。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文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018年4月6日至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2018年度工作会议在西安举行。本次会议由西北大学承办,来自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教育部社科委、教指委部分委员和特邀专家学者近30人参加了会议。中文学科组召集人、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张福贵教授传达了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学者们围绕《编制学科发展状况报告》等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研讨,并就“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文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新时代的新要求:教育部相关会议精神传达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张福贵教授首先传达了3月27日教育部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的工作会议基本精神。今年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在十九大精神指导下,注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新时代的新特色、新发展。多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效显著,已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今后要从更高层次总结经验,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内涵式发展首先是立足服务需求,优化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关键在于“立德树人”,提高质量。要扩大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的主动权,推动研究生自主招生。要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学科建设的第三方评价和多方评价工作。现代大学的本质是科教融合,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现在一流大学所占的

研究生比例已超过全国研究生数量的百分之五十。在“双一流”建设中要发挥好专家作用,学科组今后主要工作之一是指导本学科领域“双一流”建设,而不是简单的评议。今后要形成一种科学学术联盟,开展本学科的质量评估的同时也和其他学科进行一种广泛的、经常的交流。“双一流”建设是2018年工作要点,要研制评价机制和建设办法,研制学科发展规划报告,明确各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建议,加强研究生核心课程体系建设指南,加大学位的自主授权改革,动态调整。

张福贵教授根据教育部这次会议精神,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理解,希望今后学科组要配合教育部的相关工作,努力承担责任和义务。他特别感谢学科组的同志在学位一级授权合格评估和新增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工作中认真负责,严于律己,不走过场,为学科负责,完成了评审工作。他说,今后有形的和无形的工作还非常多,希望学科组的同志进一步发挥聪明才智。

二、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于学科建设和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张福贵(吉林大学):我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要把双一流建设和学科的发展作为学科组主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把全国高校的学科发展作为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上传下达,为哪个被评审评估学校做的,而是为全国中文学科负责。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认认真真,要增强政治理性和学科理性。政治理性对于学

界来说是一个底线,也是最高标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增强学术理性,用职业化专业化的学术态度对国家的教育事业负责。学术理性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承担起知识分子和我们学术界对国家发展,对十九大精神落实的特殊责任。我觉得增加我们的学术理性关键是练好内功,要适应量化指标体系,更要增强学术理性,多产出传世之作。另外,从学科分布、学科结构来看,关于语言学,也包括比较文学等问题,大家也可以讨论。当然,这里情况也比较复杂,涉及到其他学科边界关系问题。

关于研究生课程体系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核心问题。一个学科专业的特色优势和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是课程设置。现在很多学校是因人设课,不太考虑学术的承传和特色的培养。要从特色和承传来设课,用课程来加强学科特色和学术承传。课程没有了,特色和承传可能就断了。所以说,课程是要培养和设计的。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按照“双一流”的建设标准来看,中文学科虽然在国内是最好的,但在国际上很难说是一流的,这主要是语言学拉了后腿。因为语言学在世界上的评估标准要看在国际上的发表和引用情况,语言学有全世界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理论语言学、语言与认知、语言与大脑、语言与社会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在我们这里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曾提出将中国语言文学分成两个一级学科,也有人建议再设一个学科门类。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语言学可能太小,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和中国文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还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语言学学科里,除了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外,还有语言学理论和一些交叉学科,如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民族语言学,语言工程,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等,如何平衡各分支学科间的关系,

是我们应讨论的问题。此外,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在我们本土产生和发展的,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们的学术也要走出去。和海外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研究院,可以形成一个互补,将双方的学术优势结合起来,推进中国的学术走出去。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我们看到的大趋势是人文学科地位和作用的提升,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今后的学科发展中人文和技术的深度结合。这也预示在今后的学术格局中人文学科的地位会提升。语言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在今后的教育体系里,有更多的人才需求。语文所培育的素养和知识,是21世纪合格公民必备的。今天的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翻译,与语文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变得越来越紧密。今后将面对国际大环境,文学也会是大语境下的文学,像比较文学这样的学科,将来还会乘风破浪,这是毫无疑问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意义,强调这对人类将来可持续发展具有的战略意义。所以,无论是语言学还是文学,这些学科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生长,比如文学生长为门类,语言学生长为一级学科,这些都是我愿意看到和给予支持的。

陈晓明(北京大学):我们跟QS官方以及美国、英国的大学,做了很长时间的调研。西方的语言学科和我们中国的语言学科的概念还有些不一样。西方的 modern linguistic 即现代语言学,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学科,包括自然语言学、社会语言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而我们说的中国语言文学,包含在QS的 modern languages,即“现代语言”学科之中。QS是英语主导的,这个排名单列“英语语言文学”学科,除了英语语言之外,其他所有现代语言文学研究都放在 modern languages “现代语言”学科中。比如说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西班牙

语言文学研究,日本东大的日语语言文学研究,哈佛大学的法语语言文学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等,都绑在一起,这是个很大的范围。如果中国汉语言文字学与文学分离开来,传统的语言文学的核心内容还会涉及到什么,与汉语言文字学又会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陈引驰(复旦大学):我觉得在大学的建设和学科的建设上,不适宜遵循单一的标准和指标。西方一些大学排行榜,其实是商业性公司做的,真正的大学并不会在意它们。都看体量,看项目,看经费,看论文,比来比去,意义很有限。像普林斯顿大学没有商学院,没有工学院,没有医学院,照我们时下的标准,它还能是一流大学吗?要有综合性的巨无霸学校,更要有具有特色的大学,拥有某方面不可替代的突出优势。学科建设也是这样,以中文而言,你八个二级学科都强,当然好,不过,其实做不到;我看如果有三、五个领先,就是强的了;还有的如果在一、两方面具备相对优势,那也很好啊。北美比如当年洛克菲勒大学有王浩做哲学,麻省理工有乔姆斯基做语言学,那不就是不可忽视的学术重镇吗?现在用一把尺子来量,实在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尊重差异,尊重多元,尊重特色,这样才会形成正常的百花齐放的境界。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 and 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的建设,也许可以和本次会议安排的学科发展报告、核心课程设计等工作结合起来。学科发展报告应通过比较研究来分析本学科的基本设置、潜在空间和发展方向。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更多了解和参与国外同行的那些评估,不能完全不加理会。比如QS的同行评价所占分量非常大,如果不参与,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当然会被低估。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把这个当回事,因为它毕竟主要是英语世界的运作,就连欧洲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学也可

能被忽略。另外,对基础学科而言,特别是人文学科,只能尊重基础学科的自身规律才有望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如果对目标的描述过于空泛,人云亦云,恐怕也有问题。我认为基础学科要坚持基础学科的标准,大学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学术,不能为似是而非的时尚所左右。近些年,美国、英国的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其实都在试图加重中国的分量,西方标准中的中国元素也一定会越来越多。因此,中国的基础学科在其中肯定会占有重要地位,更关键的问题,倒是我们自己必须有所持守。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学科建设现在面临很多挑战,怎么留住人才就是重要问题之一。就各个二级学科最优秀的学者来说,学校尽量给他们相应的支持,保证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当然,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在人才大战的背景下,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选择空间。我最担心的是“双一流”建设对于学科的本有之义的忽略。如母语的运用问题,博士论文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论文的稿子也好,在目前教学模式下过多呈现出一个色调。中国语言文学怎么研究,我们自己的范式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课题。在“双一流”建设里能不能保持特色是特别重要的。我认为打开母语有无限种可能。但目前流行的教学方法只体现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可能。作为一个中文学科的研究者,对汉语的把握能力要强。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种办学的特色。现在二、三线城市的高校、专科学校缺少好老师,教育生态确实有问题,出现较严重的同质化倾向。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形成一个中国学派,就要有教育的个性。每个学校应有差异性办学理念。办学特色非常重要,能够营造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环境,才能有精神的突围,让我们的青年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针对已完成的学科评估工作,跟几位老师交换意见之后,我觉得我们做得对,我们是出于良知的,出于对学科建设的考虑,希望以此来促使学校重视中文学科的建设。很多学校申请到中文学科点以后,又把中文学科边缘化。通过抽查评估、限期整改等措施,也是对他们的促进,因而我们该坚持的原则还得坚持。另外,语言学的内容太复杂了,甚至可以独立成门类,即使作为一级学科,也已经远远不够了。如果学科与学科之间早有很多的不搭界,就不应还将它们挤到一级学科里。从操作性上来讲,成为一级学科可能有难度,但从学术性和学科性上讲,我认为语言学是可以独立成门类的。

曹顺庆(四川大学):语言学、比较文学作为一级学科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的学科发展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这两个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在学科设置上我们没有跟上国际步伐。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发展,像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人工智能等,都离不开语言学。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比较独特的学科,是我们当前学科跨文化、跨学科的重要据点。我们讲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如果这两个学科独立出来,一定会在人文学科起到一个很大的推进作用,跟国际接轨也会做得很好。当我们面向世界建设“双一流”的时候,这两个学科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这次会议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见,向教育部或相关部门再次强调一下,希望这件宜国、宜学科、宜学生的好事能够加快做好。

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独立成为一级学科这个问题,我们在写学科建设的时候一定要突出出来。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存在很多乱象,一些大学的课程设置比较随便,大

都因人设课。要提高教学质量,应当严格遵循学位办制定的一些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学位办文件出台以后,各个研究生院、研究生处应该根据学位办发的这个培养方案进行讨论,进行贯彻落实。这次要编核心课程,我觉得非常好。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制定出台,就要贯彻落实和检查评估,否则质量就没有办法提高,没有办法保证。

赵小刚(西北大学):我们讨论学科建设,对西部院校而言,其实主要是师资队伍问题。长期以来,西部院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遇到一定的困难。有的时候是应聘者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有的时候是学校不能满足对方提出的条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地域的原因、经费的原因、学科平台等,西部人才的流失也比较严重,因此西部的大学如何把人才稳下来是个很大的问题。

王春泉(西北大学):西部院校对整个资源的吸纳能力有限,争取人才也有困难。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对西部院校的学科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希望能够对目前还不是国家“双一流”建设专业,但是省级一流专业的一些建设单位提供大力支持。此外,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学科建设面临一个内在需求与外在约束的矛盾,如何克服这一困境尤其值得思考。

段建军(西北大学):在全国同行的支持下,西北大学文学院以打造“西部领先,国际一流”为目标,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我们现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国语言文学为陕西省一级重点学科,陕西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为陕西省特色学科,汉语言文学为教育部特色专业、陕西省一流专业。此外,我们还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与批评建设工程办公室“马工程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等。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们中文学科进入前30%，处于西部领先地位。在新一轮的高校学科发展竞争的格局之下，我们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与同类高校相比，经费投入不足；与全国一流学科相比，高端人才引育、国家重大项目承担、国际化合作研究等方面尚有差距等。

李浩(西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中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队伍建设，一方面需要教育部门加大经费投入予以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从机制、体制上不断创新。如何盘活资源，协同创新，辅翼学科，共创一流，是我们近年来念兹在兹的首要任务。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自2016年7月成立以来，先后被遴选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单位。我们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发挥西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优势，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已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如举办“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化国际高端论坛”、“杜甫与长安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聘任了党圣元、葛承雍、钟勇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为特聘教授，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系列《通讯》、《集刊》及“丛书”。希望为中国文化在新时代的返本归元、开拓创新搭建国际性开放平台，培养精英创新人才，发出西北大学声音，提供西部解决方案。

三、增强学术理性，坚守学术伦理

张福贵(吉林大学)：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分两大类：一类是外在的框架、规则，一类是内在的机制和功能。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纲要以及一些“双一流”建设的方针政策，是我们中文学科发展的外在环境和前提基础，如何在这些框架规则之

内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双一流”发展的一些设想，其实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双一流”建设之后，中文学科处于一个被相对边缘化的状态，这可能和学科价值观的成见和中文学科的特点决定的。中文学科有时候被社会看得太轻，有时候又被社会看得太重，如何调整这种错位的关系，也需要我们学科本身思考。在一段时间内，一流学校、学科和非一流学校、学科之间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双一流”建设是漫长的，也就标志着对于中文学科建设影响是空前的。

过度量化的机制制约着个人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也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分配。在过度量化机制的影响下，我们不能缺少一种内在提高的观念和思路。我们在积极适应这种量化机制的同时，也要逐步淡化这个机制。在量化基础之上，要产出影响世界的中国经典学术。开幕式中我讲到政治理性和学术理性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宿命，是当代的责任。二者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样通过真诚有效的学术环节承担起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国家发展、对十九大精神落实的特殊责任。增加我们的学术理性，关键是练好内功，在适应指标体系之下如何为民族和人类贡献更多的思想。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们中文学科组要对全国中文学科的发展负责。一方面我们要向教育部提供有利于学科发展的建议，另一方面就是如何努力对全国中文学科发展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评价。建议和评价可能都不一定十分适合，但是其中不能少的是真诚负责精神。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学者、学术评价者的基本责任，也是我们应该坚守的学术伦理。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9日，由孟飞、任雅芳整理)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李旻

前言

所谓文明，叶斐(Norman Yoffee)定义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①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在口头叙事与文献典籍之外，山川形胜、传世古物、宗教仪式、生活技艺都可能成为传承社会记忆的载体。文献典籍中的三代文明观，是先秦国家追溯历史，阐释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时使用的基本时空框架。因此，寻找三代王朝的史迹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核心议题之一。

先秦文献中，三代历史传统的开端涉及以下内容：一、圣王纾解水患，奠定早期王权；二、冶金发端，青铜礼器成为王权的象征；三、以晋南盆地和伊洛河谷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四、禹迹天下观。虽然传世文献书写的时间与它们所追述的事件间隔千年，但是它们关于过去的传述可以通过考古学手段独立考察——这些文献与传说，哪些内容是来自三代早期的社会记忆，哪些又属于后代所创造的政治传统？通过拉长历史研究的时间框架，本文尝试在考古与文献聚合之处观察早期中国社会记忆的传承，并寻找

经典传统发生的时代和动因。

本文首先使用考古聚落方法建构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两千纪中期早期中国政治格局。然后，通过考察商代的社会结构探讨商代以前的历史遗产的传承。最后，从聚落考古学角度检视文献记载中周王朝肇建时期政治地理的布局与商代之前政治空间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对社会记忆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关注的是空间范畴和辨识度的变化：从何时开始，历史地理与聚落考古分布特征出现高辨识度的契合？这涉及在考古重建的长时段历史与文献经典之间寻找承载社会记忆的时空交叉点。

一、龙山时代政治格局

(一)龙山转折：政治实验与互动网络的拓宽

本文所指的龙山时代以良渚社会的崩溃和陶寺早期为开端，以二里头的崛起为终结。^②这段时期政治发展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政治实验和互动网络的拓展。华翰维把早期国家的形成视为一个政治实验的过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权的尝试，导致这些尝试成败的历史因素，以及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积累而成的历史传统。无论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所发明

* 本文原刊于《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作者李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① Yoffee, Norman,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

② Wright, Henry T., Early State Dynamics as Politic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2006,62(3):305-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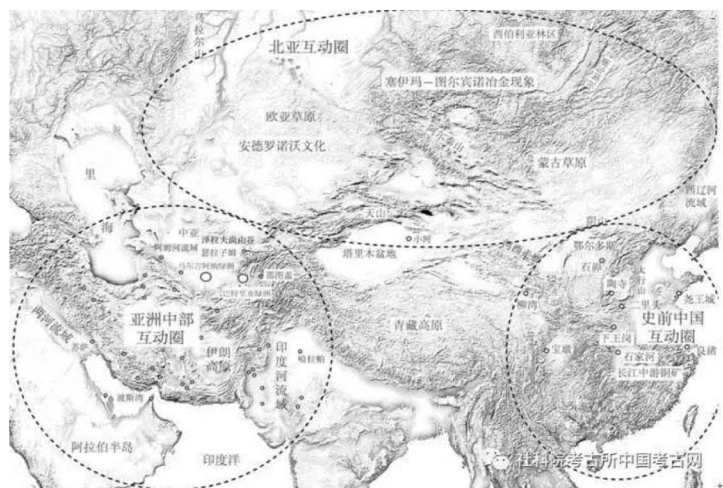
的过去,对历史遗产的强调显示政治实验这个概念兼顾了个人行动力和传统的力量。

龙山时代的政治实验在东亚、北亚、中亚三个文化互动圈交汇的框架内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张光直提出的史前中国互动圈,珀赛提出的连接东南亚与中亚城市的亚洲中部互动圈,寇尔所描述的联接草原和林区牧人与渔猎社会的北亚互动圈,在阿姆河、阿尔泰山、河西走廊、阴山沿线交汇,构成广义的龙山世界(图一)^①。三个互动圈的交汇联接起迥然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网络。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东南亚青铜时代中期城市间贸易网络的成熟,畜牧、牛车运输、和矿业的扩展,以及中亚农牧绿洲城市的发展共同导致欧亚草原流动性上升。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青铜时代城市国家通过交易青金石、绿松石、红玛瑙珠、冶金原料、象牙、海贝等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并有楔形文字文书与印信往来。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北部适合灌溉农耕与富有矿藏的地区都得到开发,并存在瑟拉子姆、绍图盖等来自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的贸易据点。位于草原与中亚之间的泽拉夫尚山谷,因为富产多种金属矿藏而成为当时重要的资源输出中心。在这些中亚绿洲城市周围的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草原陶器与居址,显示这里成

为欧亚草原与东南亚城市经济网络交汇之处。

欧亚草原与林区渔猎社会之间的频繁交流,使得北亚物质文化风格逐渐趋同,并在公元三千纪晚期形成分布广阔的安德罗诺沃物质文化传统。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开始的阿尔泰北麓林区冶金活动,到三千纪末发展成为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其具有代表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分布范围涵盖西到芬兰、东到南阳盆地的广阔地域。^②中亚、北亚的冶金传统随着这个技术与交换网络进入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富有铜矿的晋南与江汉,其合范铸造技术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发端。

中亚、北亚与黄河中上游史前社会的往来在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现端倪。青海柳湾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多座墓葬中,已经出现三角斜线



图一 龙山时代三个互动圈示意图

^①Chang, K.C.,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Hiebert, F. 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p.177, Figure 10. 8; Possehl, Gregory L., *The Indus Civilization: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Altamira Press, 2002, p.234, Figure 12. 37;

^②Chernykh, Evgenii N.,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纹与锥点纹装饰的桦皮矢箠,显示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沿线已经存在交往,北方渔猎民族与农业社会之间的毛皮贸易,可能是这种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①随后,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墓葬中陆续出现货贝、石仿贝、铜制品,这些现象出现的背景是甘青农牧社会的繁荣所带来的流动人口与远程交往上升。^②此后,这些区域间交往的拓展导致冶金技术传统、畜牧与麦作等技术在龙山社会的传播。

龙山世界中三个互动圈的交汇,导致结构完全不同的社会得以沟通,并拓展了地理、贸易、技术、宗教等知识。复杂的地貌特征、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又促使交汇区内各地社会作出不同的技术选择。其中,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中亚、西南亚、印度河流域城市社会的发展,为当时的互动网络赋予空前丰富的知识与技术多样性。这些青铜时代城市在公元前十八、九世纪相继衰落后,直到公元前一千纪阿契美尼德帝国崛起,中亚才迎来第二次城市化的潮流。

龙山时期也是一个气候、生态、与生业经济意义上一个特殊的时代。此时正值全新世气候史上一个重要的异常波动期。综合不同分析手段重建的气候纪录显示全新世大暖期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终结,气候转为干冷。其中,从公元前2400年前后开始太阳辐射的改变导致亚洲季风的减弱,出现历时约五百年的气候异常。其间数

度出现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③降水在持续干旱之后发生至少两次大规模逆转,这种现象对黄土高原地貌的破坏性尤为明显——持续的寒冷干旱造成植被减退,在暴雨来袭时,河川流速流量都超过以往,形成直接威胁河谷与山前聚落的洪灾。同时,黄土的易蚀结构加剧了植被退化后的土壤流失。大量携带泥沙的洪水到达平原地区后流速减缓、泥沙沉淀,导致下游河床淤塞,河水溢出堤岸威胁平原聚落与耕地。在黄河上游的官厅盆地,中游的关中盆地、洛阳盆地,以及黄土高原支流河谷都曾发现这类洪灾遗存。

两种洪灾成因互相关联,对河谷与平原聚落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此类相关灾变的蔓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灾变规模的扩大可能造成人员的离散迁徙,被迫放弃一些传统生存地区,向有安全屏障的河谷和高地集聚,改变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分界。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变,可能导致了公元前2300年前后,亦即龙山时期的肇始阶段,良渚和石家河等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的崩溃。在西北和黄土高原,气候干冷促进了畜牧经济的拓展。从河西走廊,到阴山—河套—鄂尔多斯—西辽河流域,玉矿、金属矿脉、盐湖、草场等资源分布地带成为不同经济型态的社会群体交汇之所。

气候的灾变改变了龙山社会政治发展的格局与走向。在这个变化中的框架之内,地形特征、

^①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51页,图37,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考古学集刊》第12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③ Wang, Y., H.Cheng, R.L.E dwards, Y.He, X.Kong, Z. An, J.Wu, M.J.Kelly, C.A.Dykoski, X.Li, The Holocene Asian Monsoon: Links to Solar Changes and North Atlantic Climate. Science 2005,308:854-857.

社会回应、经济形态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发展轨迹。尽管对各地社会如何因应这场危机缺乏深入了解,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聚落考古方法观察龙山时期几个主要政治舞台之上,以早期都邑为中心的发展轨迹。早期都邑,指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并出现政权发展、社会分化、财富集中、物质文化与技术的多样性以及远距交换的迹象。周围城镇的出现伴随着早期都邑的繁荣,共同形成包含不同层级的聚落形态。建立王权与国家的尝试可能反复在这些早期都邑中发生。随着政治实验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些尝试为后代社会留下持久的社会记忆与历史遗产。

(二)高地龙山社会的崛起

本文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概括太行山脉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聚落与相关考古学文化及地方类型——考古学文化强调器物群的排他性,而以自然地理定义的高地龙山社会强调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与各种交往。黄河及其支流成为维系高地龙山社会共同传统的纽带。虽然黄土高原复杂的地貌导致诸多风格流变,各地共享以鬲、甗等空三足器和双耳罐为核心的高地陶器造型、技术与装饰传统,并共同参与以龙山玉器为标志的交换网络与宗教传统。

自公元前 2300 年起,包括汾河下游河谷与

运城盆地的晋南出现空前规模的人口集中^①。高炜估计崇山北麓的陶寺遗址墓葬总数在一万座以上^②。墓地中最复杂的一组叠压打破关系涉及一百八十五座墓葬,为中国历代墓葬所仅见^③。墓地规模显示,陶寺居民总数,远远超过当时其他龙山遗址^④。如果以崇山南麓拥有两万座墓葬的曲村为参照,陶寺人口的规模大致相当于这座西周都邑的一半^⑤。陶寺遗址绝大多数墓葬朝向崇山主峰,表明随着早期都邑的成长,当地社会形成一套以崇山为中心的山川信仰,帮助陶寺大量集中的人口建立新的宗教传统与社会认同。苏秉琦指出,崇山南、北两侧的龙山聚落,共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群^⑥。长约五十公里的汾河谷地之中的这个环崇山聚落群成为龙山时代中国社会中人口最稠密的区域。这里发现的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可能体现了当时大型政治联盟的形成。

除了庞大的人口规模,陶寺体现出社会分化与文化多样性。以陶寺为首的晋南龙山社会,汇集来自辽东、山东、江淮,到河西走廊和鄂尔多斯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物质文化传统。相较于龙山时期之前的墓葬随葬物品大量重复的特点,陶寺早期的高级贵族墓葬

①He Nu, The Longshan Period Site of Taosi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In Anne P. Underhill ed: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 Wiley—Blackwell, 2013, pp.255—277.

②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394页,文

物出版社,2015年。

④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⑤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⑥苏秉琦:《华人、龙人、龙的传人、中国人》,29页,辽宁出版社,1994年。

体现一套更加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葬俗,墓主佩戴绿松石镶嵌腕饰,置身铺满朱砂的木棺之中,随葬乐器与丰盛的漆木彩绘陶器。苏秉琦用“王者之气”这个概念来描述陶寺早期统治者用物质文化来昭示权力与威望的尝试^①,并不纠缠于酋领与君王之间的类型学差别。陶寺早期墓葬出土的鼗鼓、石磬,是以钟磬为核心的三代贵族音乐的滥觞。这些三代文明核心符号的发端显示陶寺在早期中国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陶寺南北的次级中心也都有发现以彩绘陶器和玉石兵器为主要陪葬品的墓地。类似的遗存出现在高地社会周边的河谷走廊,例如中条山南麓清凉寺墓地和太行东麓的汤阴白营遗址龙山早期遗存。

陶寺遗址规模在中期达到全盛。中期 M22 号大墓,规模与殷墟妇好墓与三门峡虢季墓等商周高级贵族墓葬相当^②。但是它的结构与商周礼制非常不同——墓室四周设置十一个壁龛,用于陈设食物、彩绘陶器、漆木酒器、玉器等。大墓在下葬不久即遭盗毁,残棺周围散布的绿松石镶嵌残片,盗洞内遗留的货贝显示出揭示陶寺早中期社会已经参与了前述自马家窑文化晚期开始形成的跨区域互动网络。附近拥有一千五百多座墓葬的下靳墓地,也出现佩戴绿松石镶嵌白石贝腕

饰的墓葬,如 M76。在陶寺与石峁墓葬中发现的铜玉合璧制品,进一步显示高地龙山社会与中、北亚冶金社会的间接交流以及物质文化领域的融合与创新。

陶寺晚期遗存呈现出跨区域交流的上升。其中,晚期 M3296 墓墓主腰间佩戴的铜铃是金属响器首次在古代中国出现,并为后来的二里头贵族文化所传承。一只陶扁壶上的朱砂题名,书写形式与结构已经非常接近殷商甲骨文^③。而城中暴力行为遗留下的证据、贵族墓葬与宫殿建筑的系统毁弃集中反映出晋南龙山政权的脆弱性^④。

陶寺中晚期之间的变故,伴随着于来自晋陕高原中北部的各种肥足鬲和单把鬲为主的器物群的上升,牛羊畜牧的增长^⑤。因此,陶寺及其周边遗址在晚期发生政治动荡的主因,可能源于黄土高原的政治势力对晋南盆地的渗透^⑥。这促使我们把视角转向高原社会。这里黄河支流河谷贯穿高原,形成连接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晋南盆地的通道。作为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的交界地带,物资的交换、人群的往来、政治势力的冲突在其间反复上演。而四千多年前,南北的折冲造在这里造就的不是军事边界,而是一个规模与陶寺相当的新兴宗教与政治中心。

由三重石墙所环绕的石峁山城,建于秃尾河

①苏秉琦:《华人、龙人、龙的传人、中国人》,71页,辽宁出版社,1994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③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⑤博凯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利用的变化个案研究——山西省龙山时代晚期陶寺遗址的动物研究》,《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⑥韩建伟:《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谷高低错落的黄土台地之上^①。其核心建筑是至少十一级、顶部面积约八万平方米的皇城台，其上布满大型宗教或政治聚集活动后留下的遗物，包括陶器、玉器、人兽骨骼以及壁画碎片。皇城台附近分布有高规格的石墙建筑和贵族墓地，其大墓规模及格局与陶寺 M22 号大墓接近，并建有壁龛。

另一核心建筑是位于山城内制高点的东门。这里远离西面河谷内的交通要道，规模宏大的石筑城门建筑群朝向沟壑纵横的旷野。东门石墙上曾装饰有彩绘几何纹壁画、石雕人头、坐像、立像以及大量玉器，门地道下发现多个人头祭祀坑。这些独特的遗迹和选址特征共同显示强烈的宗教性特征——东门不仅是城郭的入口，而且是仪式之门。这些新的仪式场景表明，一个大型宗教与政治聚集的中心在陕北形成。

石峁遗址内墓葬和祭祀遗迹曾经理藏数千计的玉器。东方西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江淮流域，西方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南方江汉流域后石家河龙山文化作坊都有玉制品流入，反映了龙山时代交换网络的扩展。无论是埋藏于特定地点，还是系统地插入石墙，石峁玉器的使用特征强调的是营造与界定神圣空间。中国史前社会使用玉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尤其是作为贵重物品随葬于长江下游的良渚贵族墓中，但以玉器祭祀山川的做法，在龙山时代才开始在各区域社会中广为传播。

造型方面，高地龙山玉器群结合东方社会传

统形制和新创造型。陕北石峁、芦山峁等遗址不仅使用良渚传世玉琮，还使用来自各地龙山作坊的仿制品^②。同时，石峁遗址的仪式性活动中大量使用玉牙璋。早期中国许多考古遗址的埋藏场景显示玉牙璋的出现与山川祭祀仪式有关，例如浙南罗圈峪的丘陵石缝中、洛汭花地嘴的祭祀坑中、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的河畔祭祀坑中。玉牙璋和相关仪式的扩散，可能体现了一种新的宗教网络的跨区域传播——在这种宗教传统中，这些玉器被用作祭器来召唤山川形胜中的超自然力量。

石峁发现的人头石雕、坐像、岩画、货贝、绿松石珠、鸵鸟蛋壳、铜齿环以及大量散落的打制石器揭示了高地龙山社会与北亚、中亚互动网络之间的联系。公元前三千纪后期，从图瓦至贝加尔湖一带，阿尔泰山林区畜牧与渔猎社会盛行在山上营建兼具宗教与防御功能的石城，其中遗物属于奥库涅夫物质文化传统^③。这些山城是林中百姓举行仪式聚会与祭祀的重要场所，其中包括人兽牺牲，以及将石雕人像、人头、浮雕立石筑入石墙的建筑传统^④。

石峁和陶寺发现的铜制品，与欧亚多金属冶金技术传统的扩张，特别是针叶林区合范冶金技术向东南传布的时空趋势相符。作为历史悠久的欧亚冶金网络的东端，北亚渔猎社会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就出现冶金活动。当地工匠掌握包含陨铁在内的多金属冶金知识，并在三千纪末发展出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②邓淑萍：《杨家埠、晋侯墓、芦山峁出土史前玉琮的再思》，《玉润东方》，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③Jacobson-Tepfer, Esther The Hunter, the Stag, and

the Mother of Animals: Image, Monument, and Landscape in Ancient North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Gotlib, A. I. and M. L. Podolskii, Sve-gornye-sooruzheniia Minusinskoy Kotloviny. Elexis-Print, 2008.

造型简单但技术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①。当这些物品、技术与畜牧经济沿着高原河谷南下之时，以陶鬲为代表的高地龙山传统也向北渗透。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朱开沟、石峁所见的蛇纹陶鬲已经频繁地出现在从蒙古到贝加尔湖畔的北亚石棺墓中，揭示出黄土高原与北亚草原和林区之间的跨区域交换与人口流动在游牧经济出现之前已经颇具规模^②。

（三）东方低地龙山社会

低地龙山社会延续了从裴李岗时代以来数千年未曾中断的用鼎传统。随着良渚与石家河两个长江中下游主要宗教与政治中心的瓦解，贯通东方平原的淮河流域成为低地龙山社会发展的中心舞台^③。从桐柏、嵩山到泰沂山区南麓，淮河流域支流河谷构成密集的交通网络，连接周边龙山社会。同时，淮河流域社会在东方物质文化的扩散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良渚、山东、后石家河龙山玉器可能通过淮河流域到达黄土高原。

在淮河流域的西北角，瓦店、王城岗、古城寨、平粮台等龙山晚期城邑兴起于嵩山南麓河谷和周边平原。颍水河谷中的瓦店（约一平方公里）是淮河上游最大的龙山都邑，并与长江中游地区与高地龙山社会交流频繁。淮河流域北部的山台寺遗址发现作为祭祀牺牲瘞埋的九头黄牛与蛋壳黑陶残

片共存，显示来自高地社会的家畜被引入东方社会以猪为主的传统宗教仪式^④。这个发展对以牛、羊、猪为中心的三代祭牲传统的形成尤为重要。

在淮河流域的东北角，两处重要的龙山都邑尧王城（约四平方公里）和两城镇（约一平方公里）兴起于鲁南海滨的日照盆地。当地物质文化体现出的连续性，说明这两处龙山都邑是以陵阳河等大汶口晚期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当地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同时，鲁北城子崖、桐林等一群中小型龙山城镇沿泰山北麓一线排开，并通过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保持海上交往。这些龙山城镇可能各自为政，也可能形成以鲁南两个都邑为中心的东方政治联盟。

山东龙山社会的墓地虽然远不如陶寺墓地规模庞大，但也呈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墓葬随葬猪下颌骨、獠牙等做法延续裴李岗时代开启的仪式传统。快轮制作、陶胎极薄的蛋壳黑陶承袭自东方良渚—大汶口社会的宴饮传统与制陶技术。尹家城等龙山墓地与高地龙山社会一样出现破坏贵族墓葬的情况，成为龙山时代社会动荡的证据。临朐西朱封三座大墓规模与陶寺大墓接近，拥有彩绘棺椁、边厢、以及精美的酒器，墓主可能属于当地龙山聚落领主。西朱封大墓出土的白玉镶嵌绿松石头饰和两城镇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与陶寺与下靳出土的绿松石镶嵌

^①Sherratt, Andrew, The trans—Eurasian exchange: the prehistory of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In V. M. Mair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p.32—53.

^②刘观民：《苏联外贝加尔湖所出几件陶鬲的分析》，《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刘斌、王宁远：《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物》2004年第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④吕鹏：《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及其在宗教仪式中的应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0期，2010年。

头饰与腕饰制作工艺相同^①。这种绿松石镶嵌腕饰,分布范围从黄河上游到山东沿海,体现了龙山世界中各地贵族之间密切的交往。绿松石镶嵌技术传统后来为二里头和殷商王室作坊所继承,成为三代文明贵族艺术的核心内容之一^②。两城镇遗址早期调查发现的环纹货贝在海洋资源丰富的良渚和沿海贝丘中都未曾出现过,更可能是通过高地龙山社会辗转而来^③。山东的璇玑造型玉器,也揭示出渤海沿岸龙山社会与石峁之间的密切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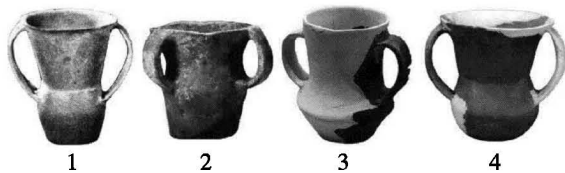
淮河流域以北,焦作西金城、辉县孟庄、安阳后岗、汤阴白营、邯郸涧沟、任丘哑吧庄等一系列龙山城镇沿太行东麓平原分布,并成为太行两翼龙山社会交往频繁的地区。白营、哑吧庄等遗址的龙山陶器群,汇集黄土高原、淮河流域、以及山东半岛的作品和制作技术^④。西金城与孟庄城址都发现大规模洪水破坏的痕迹,可能是气候波动与地形特点交叉作用的结果。

(四)龙山时代的核心特征

从考古学角度看,龙山时期是一个灾害频繁、政治动荡的时代。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的落

幕与高地龙山中心的崛起是龙山时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融合多生态区、多经济形式、与多区域文化形成的龙山知识体系与技术传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知识前提。龙山都邑中早期王权的发展可以从这个拓宽的知识体系中选择新的符号、造型与技术来创造新的政治表达方式与礼制传统,使得龙山社会成为形塑新兴传统的辐凑之所。其中,青铜、文字、货贝、骨卜与牛羊牺牲的使用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传统^⑤。

连接关中与江汉的商洛走廊成为高地龙山社会矿冶知识南下的通道^⑥。公元前二千纪初,具有甘青齐家文化特征的高地龙山陶器群分布通过关中洋西、蓝田泄湖、商洛东龙山,到达商洛走廊南端的浙川下王岗和郟县辽瓦店子(图二)^⑦。下王岗发现的一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



图二 龙山陶多耳罐

1. 青海柳湾 M114 出土
2. 商洛东龙山 M43 出土
3. 河南浙川下王岗出土
4. 湖北郟县辽瓦店子 G21 出土

①中美两城镇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 1998-2001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 年第 9 期。

②庞小霞:《中国出土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研究》,《考古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日照县两城镇等七个遗址初步勘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2 期。

④王青:《试论任邱哑叭庄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原文物》1995 年第 4 期。

⑤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

⑥张天恩:《论关中东部的夏代早期文化遗存》,《中国历史文物》2009 年第 1 期。

⑦青海省文物管理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图版 183,文物出版社,198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商洛东龙山》,图版 16,科学出版社,2011 年;安阳博物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浙川下王岗出土陶器,石涛拍摄;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移民局、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南水北调工程考古报告集》(第四卷),图版 23,科技出版社,2014 年。

矛显示欧亚冶金技术网络已经伴随齐家文化的南下延伸到富藏绿松石与铜矿的汉江流域^①。无论是渐渐积累还是系统地勘查,矿藏知识的汇集构成青铜时代王权国家的知识基础。

剧变的社会以及壮阔的山川形胜,为创造具有政治与宗教意义的传说,提供最佳的脚本。尽管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是根据传世文献的线索展开,随后的系统性区域考古调查与钻探证实陶寺的确是龙山时代晋南盆地的中心聚落。从发现至今,陶寺与传说时代唐、夏政权的关系,一直是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②。传世文献中的历史地理线索、碳十四年代测年、陶器编年,为上述讨论提供了基本的时空轮廓。

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其他龙山都邑。颍河河谷中的王城岗和瓦店,淮河中游的禹会遗址都座落于文献传说中的热点地带^③。禹会祭祀遗址的大型夯土长台正对淮河穿越涂荆二山之间的豁口。长台的建造过程使用不同色泽的土层形塑出起伏的表面与交叉的土岭,台上曾燃有火焰,台基留有用于安插旗杆或木柱的长排柱洞。周边大量散布祭祀与宴饮活动遗留下的陶器与兽骨,其来源复杂的陶器群显示仪式的参与者来源甚广^④。淮河干流穿山而过的壮丽景观使这个布莱德利所谓“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自然形胜”成为古代社会宗教朝圣或政治聚会的理想选址^⑤。

考古材料的持续积累和年代学细化加深了我们对考古分布特征与文献传说中两者关系的了解。龙山时期之前与之后的社会记忆,在时空框架的辨识度上出现重大变化。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良渚,在规模上比陶寺、石峁、尧王城等龙山都邑更庞大、财富更集中、社会结构也更加稳定。然而,文献中未留下关于江南史前文明的线索。在神话传说中我们也很难辨认出与良渚神徽相关的宗教与政治传统。相较之下,《史记·晋世家》对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传说政权唐的历史地理描述,可以达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这样具体并与晋南龙山时代聚落考古特征高度重合的时空范围。晋南盆地成为周人传说叙事的重要场景,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是传说时代故事集中发生的时段——这是讨论古典文献中传说叙事的基本坐标。下面的议题是龙山时代政治和宗教遗产如何为青铜时代的中国社会所传承,并成为为周人历史知识的源泉。

二、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兴衰

(一) 二里头时代——洛阳中心政治格局的形成

公元前十九世纪前后,晋南、山东、颍河流域龙山都邑相继崩溃,各地出现大幅度人口下降^⑥。在晋南,后龙山时代遗址的数量稀少与庙底沟—龙山时代遗址的密集分布形成显明的对照。同

①高江涛:《试论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牙》,《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

②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市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⑤Bradley, Richard, *An Archaeology of Natural Places*, Routledge, 2000.

⑥史宝琳:《中原地区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和公元前两千纪的聚落分布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样，山东在龙山中期之后开始陷入持久的衰落中，当地岳石文化遗址数量稀疏，物质文化也出现明显的衰退^①。虽然此番巨变对早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影响深远，我们对龙山社会的崩溃过程与原因尚没有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后世文献也没有留下相关传说线索。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崩溃会导致社会记忆的中断与失散，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文化延续的考古证据。

随着陶寺、王城岗、瓦店、尧王城等龙山城邑的相继衰落，早期中国主要的政治舞台，开始向嵩山周边河谷转移。先是淮河流域上游出现新砦古城，其复杂的物质文化与陶器传统显示来自南北和东方各地势力的整合。随后，洛阳盆地内出现与新砦规模相当的花地嘴遗址。这里发现有大量祭祀坑，埋藏有精致的宴饮陶器、大型朱绘陶瓮、以及人畜牺牲。祭祀坑中黑玉牙璋的发现揭示出与龙山宗教传统紧密的联系^②。花地嘴坐落于邙山之尾的台地上，俯瞰伊洛河穿山入黄河，是洛汭形胜的一部分。地貌学调查显示洛阳盆地在龙山时代曾经历了大规模洪灾，因此花地嘴的发现可能与山川祭祀活动有关^③。新砦和花地嘴使用时间都不长，在公元前十八、九世纪前后伴随二里头的崛起而相继衰落。

在龙山时代的政治格局中，嵩山北麓的洛阳盆地处于高地龙山社会与淮河流域之间的过渡地带。二里头遗址由许多环绕于嵩山地区甚至外围来源更广泛的社群聚合发展而成。二里头的炊

具主要包括当地的深腹罐、来自关中盆地和商洛走廊的花边罐、以及嵩山南麓淮河支流河谷的各种陶鼎^④。陶器制作也结合不同地区的技术，例如二里头一期在高地花边罐造型的鼎身上侧装三角形鼎足，是移民社会中物质文化和工艺传统重新整合的产物。

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2002VM3)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都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反复出现的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组合，显示身体的运动与金属制品的声音、光泽与色彩的紧密结合。这些非凡的体验，以及使用青铜容器加工与饮用的酒类，成为二里头文明宗教与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源泉。从在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它们的出现是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早期中国辐辏聚合的证据。

矿业的拓展是二里头青铜冶铸与绿松石加工业兴盛的前提。二里头遗址青铜、绿松石作坊选址紧临宫殿区，显示当地政治权威对贵重物品生产的掌控。二里头遗址的早期青铜器制造工艺，源自草原、林区、中亚三地交汇区域中出现的合范铸造技术，是欧亚冶金网络的东亚延伸和本地创新。除了鼎等传统造型之外，二里头陶器与

①方辉：《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文史哲》2003年第3期。

②张莉：《从龙山到二里头——以嵩山南北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1247—1263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铜器包括一些新出现的特殊器型,例如长流爵、管流爵和封口盃,其设计目的集中于材料的加热过滤与精确调配,显示出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交汇的大背景之下祭祀仪式与宗教体验的拓展,并因此成为三代青铜礼器传统的直接来源。

在洛阳盆地之外,二里头在其近畿地区以及连接长江中游与晋南盆地贸易网络的沿线要地兴建了一系列据点,便于二里头政权控制金属矿藏、绿松石、盐、朱砂,以及其他重要的自然资源^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二里头据点都很小,其几万或十几万平方米的规模与之前晋南盆地数百万平方米的龙山都邑不成比例。这个现象揭示出龙山社会崩溃留下的深远影响——晋南政治中心的衰落,使晋南盆地从一个龙山社会发展核心地区变成黄土高原社会与新兴中原政治势力之间的中间地带。晋南人口衰退的现象持续到公元前一千纪初天马曲村的建立才开始得到逆转。

二里头着重青铜礼器的生产,以及向中条山和江汉产铜地区的扩张,表现出三代文明一个重要传统,即以金属矿藏为核心的政治山川观念的形成。前述齐家文化特征的器物群沿商洛走廊进入江汉流域的分布特征显示这个过程在龙山晚期已经开始,并在二里头时代形成颇具规模的知识体系。作为第一个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早期政权,二里头的影响力兼跨晋南盆地、伊洛河谷、淮河流域——该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原中心政治格局初步形成^②。

(二) 二里岗时代——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

巩固

商王朝的出现标志着太行山东麓河内政治势力的崛起。在田野考古中识别商代聚落,并为其分期断代,主要依赖对高地社会日用炊具陶鬲的类型学观察。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晋中风格的陶鬲跟随沿着太行河谷走廊向东迁徙的高地居民出现于太行山与古黄河下游河道之间史称河内的狭窄平原。从太行西麓的太原盆地到东麓的河内平原,我们可以从杏花、白燕等遗址看到高地龙山制陶传统的发展,以及与下七垣文化陶器传统的连续性^③。相较于二里头遗址的技术与政治发展,河内下七垣文化聚落之间体现出紧密的联系,但鲜少发现中心都邑的迹象,也没有发达的冶金。

这个下七垣文化器物群是黄土高原陶器传统第一次系统的出现在低地平原。二里头三、四期遗存中陶鬲的数量明显增加,显示河内对洛阳盆地的渗透。四期后二里头古城的衰落,伴随着二里头遗址东邻偃师古城以及洛阳盆地以东的郑州古城的兴建。偃师与郑州的陶器组合都以下七垣文化的陶鬲为核心,表明洛阳盆地内外物质文化与政治的变化是由河内政治势力,沿古黄河南下,进入洛阳盆地,征服二里头政权造成的^④。

作为新兴政治中心,郑州商城继承了二里头的技术知识、人力资源、以及政治经验。以陶鬲为核心的二里岗文化从郑州向外扩张,分布范围西到关中、南到湘西、东到鲁中、北到燕山。自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偃师与郑州古城兴建起,至二千纪末殷墟废弃止,这种陶鬲表现出连贯的风格演

^①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Duckworth, 2003.

^②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③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272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④刘绪:《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变,其分布时空特征与文献中对商王朝的描述基本重合。因此,政权更替是对考古学所见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洛阳盆地内外所发生的政治与文化变局的合理解释^①。

许多迹象表明二里头的政治网络和地理知识为早商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蓝图。在望京楼、垣曲、东下冯、东赵、盘龙城等遗址,许多早商据点兴建于二里头聚落之上或近旁。郑州还通过盘龙城据点的设立,巩固并拓展了对长江中游铜矿区的控制。只有早商向太行两翼、关中、以及山东的扩张突破了二里头政权的格局。商王朝物质文化融合了两个区域传统。一方面,商人的扩张彻底打破了龙山时代以来高地与低地饮食传统之间以鼎、鬲为别文化区隔。陶鬲技术与风格的连贯性来自制陶技术在族群内的传承,也是商政权以器用巩固其文化特征与身分认同的措施。另一方面,二里头政权消亡之后,商人贵族文化沿用了二里头用于祭祀宴飨的铜鼎造型与铸造技术。郑州冶金作坊制作的大型青铜方鼎,已经成为商王朝政治与宗教权威的核心象征。同时,商人工匠能成熟地使用绿松石镶嵌,并掌握包括陨铁在内的欧亚多金属冶金传统。这些技术使商文明在殷墟时代达到三代物质文化的巅峰。

(三)殷墟时代——重返河内

早商王朝在迅速扩张后频繁迁都,最终返回河内平原的殷墟。殷墟发现的宫殿基址、各类作坊、王室大墓、大规模人畜牺牲、甲骨卜辞,为文献有关殷商王朝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证

据。武丁之后,殷商王朝相继放弃早商在关中、晋南、洛阳盆地、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中游设立的据点。在江淮和关中,因早商扩张而出现的二里岗上层文化陶器群,为风格各异的地方传统所取代,而这些地方传统常常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在晋南和洛阳盆地内,殷墟二期之后聚落数量与规模都急剧下降——商人与黄土高原上的高地政治势力之间的持续冲突使晋南盆地几乎成为一个无人区^②。

殷商对洛阳和晋南盆地的放弃意味着二里头所建立、郑州政权所巩固的中原中心格局的解体。从聚落考古学角度看,河内位居高地社会边缘。殷商王朝政治重心向河内的回归,使其在空间上进一步远离晋南和洛阳。这种政治格局与历史地理特征对理解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和周人灭商之后以三代历史地理为蓝图的建国叙事有关键影响。

(四)在空隙中延续的历史传统

吉德炜曾以多孔的瑞士奶酪来形容晚商政权结构——在商人军事据点之间和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带,仍存在许多非商政治和文化传统^③。这个比喻,有助于理解商代之前的政治遗产如何为周人所继承。即便是在早商势力极度扩张之际,那些反抗商人统治的政治势力,或是位于商人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高地社会,仍然在传承龙山时代的政治遗产。在黄土高原,龙山时代的重要中心石峁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依然存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建筑、以陶鬲和彩绘陶器为中心的制陶业都继承了高地龙山社会的文化特征。

①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②刘绪:《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③Keightley, David N. The Late Shang State: When,

Where and What? In David N. Keightle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523-654.

许多证据显示高地社会存在与商为敌和与商联盟的两种势力。在武丁王室卜辞中,妇好曾经率军队讨伐西部高地的敌人。妇好墓双壁龛的特殊结构和随葬器物特征,都显示妇好可能是一位与商王联姻的高地贵族妇女。浮山桥北先族墓地也可能代表晋南盆地北缘与殷商王室关系密切的政权^①。浮山以北的高原河谷中,分布的着以李家崖、辛庄、高红为代表的山城遗址。他们很可能是殷墟卜辞中商人称为鬼方、羌方、土方和(工口)方一类的敌对力量^②。从空间与制陶传统来看,它们与高地龙山传统有传承关系,未曾被纳入二里头和商王朝直接控制之下。本文把这些区域社会称为高地记忆群体,他们与殷商王室史官共同成为周人多元历史知识的直接来源。

三、三代历史山川与周王朝的建国蓝图

探究周人营建新天下秩序时使用的历史、地理知识谱系对理解经典传统中三代文明观的形成十分关键。公元前二千纪末兴起于关中盆地的周人,与太行东麓的商人一样拥有以陶鬲为主的高地炊具传统。两个政权分别兴起于中原的东西两端,从原来的边缘势力,先后向中原中心进发,成就政治霸权。相似的政治空间结构,促使周人采取与商人类似的建国策略——商人和周人均在被征服的前朝都城附近设置军事据点,以监管、控制前朝遗民。此外,商与周均利用前朝遗留下来的技术与人力,建立新的国家。

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历史地理背景,也使得

他们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利用不同的政治资源,达成其建国使命。四个重要政治舞台的空间关系,即西边的关中、中间的晋南与洛阳、东方的河内,成为理解周人历史观的基石。从周人的关中视角来看,这四个地理单元呈现出时空倒置的排列次序——年代越早的政权,距离关中越近,时间越近的政权,地理位置越远:陶寺与石峁,位于关中的近东和正北;二里头位于更东部的洛阳盆地。殷墟最远,位于周原东方近千公里之遥的河内。这个大约有一千年时间纵深,一千公里空间跨度的时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周人如何运用过去的知识营建其政权的正当性。

周原处于两个历史传统交汇之处。在南北轴线之上,周原位于从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的高地社会网络中间。高地龙山社会的遗产为周人建立西土政治联盟和进行军事动员提供共识基础。根据周人的建国叙事,在定居岐山之前周人部落曾周旋于晋陕高原戎狄之间,这正是考古所见高地龙山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地带。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在这里生活的鬼方、羌方等高地政治势力,不与殷商共享政治立场与宗教传统。而周人可以通过与这些高地记忆群体的交往了解到高地龙山社会的历史遗产。宝鸡(弓鱼)伯墓地与石鼓山墓地所代表的就是这类周人高地盟友,其随葬物品的来源体现出这些贵族与四川与甘青等高地社会的密切联系。

在东西轴线之上,周人以三代为核心的历史

^①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②王国维:《鬼方、昆夷、狁狁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文物出版

社,201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年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试掘简报》,《三晋考古》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地理观是周王朝规划天下蓝图的基本坐标：周人首先一统关中盆地以作为根据地，然后占领中间夏人故土，最后则征服东方的商王朝腹地^①。灭商之后，周人推行的封建制度，也是围绕夏、商、周三代空间架构完成。更遥远的东方和南方，则是属于东夷和蛮族的世界以及他们古老的传说。

从关于周人在位居中部的夏人故地营建两处政治中心的文献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代之前的政治遗产对周人政治秩序的影响。从考古角度看，殷商政治势力从中间两个盆地的撤出使得周人领导的西土联军可以直接进入河内王朝核心区域。同时，在关中和河内之间横亘两个无人盆地也使得西周政治版图面临东西分裂的威胁——三监之乱就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二次东征之后，周人对商遗民的强制外迁与对殷商王室墓葬的系统盗掘终结了殷墟近两百年的都邑传统^②。河内平原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从此退出早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庄白窖藏铜器铭文显示西迁的微史家族把商王室的历史传承带到周原。了解这些知识的谱系有助于理解周人历史观的多重来源以及周人在历史的名义之下采取的政治措施。以下对文献与聚落考古特征的比较研究，显示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记忆为号召重建了晋南和洛阳社会，并因此恢复和巩固了中原中心的政治秩序。

（一）“有夏之居”的洛阳盆地

偃师商城废弃之后，殷墟时代的洛阳盆地中居民很少，没有任何大型聚落。克商之后，周人建

国叙事里对天下之中在嵩山的历史空间定义，表明周人亟欲重拾商代以前的政治传统，通过回归以洛阳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来营建周天下。《逸周书·度邑解》描述了武王选址洛阳建立新都在宗教、政治、与历史方面的考虑，“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今，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由于洛阳盆地紧邻太室嵩山，因此肩负维护天命的重任；又因其座落于夏人故地，强调洛阳作为政治和历史空间的正当性。

所谓求中，是对王权正当性的空间定义，而中原的概念随地中的认识而改变。在周人的建国叙事里，雒邑兴建于灃河沿岸，这个区域也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克商不久后铸造的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域”的表达显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的概念在周人克商时就已经存在。因此，周王朝的创建者们是使用一个历史空间概念引导周人以封土建国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秩序，而不是根据其实际控制的地域，推算出来一个“四方人贡道里均”的中心。

天下之中的空间定义与有夏之居的历史认知紧密相连，而与殷墟卜辞中“大邑商”和《诗·商颂》“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所代表的空间秩序显著不同。从考古学角度看，周人选择在嵩山南麓龙山时代王城岗城址附近设测景台，声称洛阳为天下之中，而非选择丰镐、晋南、郑州或其他位于周原与安阳之间重要的战略地点建都，表现出周人希望继承王城岗—二里头历史传统的政治理想。

^①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简楚《容成氏》、鬲公盨和虞遂诸器想到的》，《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②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考古》2010年第2期。

在经历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繁荣和后半叶的没落之后，洛阳盆地再度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关中的丰镐和岐邑一起成为西周王朝都城。迁商遗民入洛阳和关中，缔造了周原、丰镐、雒邑三个西周都邑手工业的繁荣。如果观察洛阳盆地内的聚落特征，我们可以发现时代间隔约五百年的二里头与西周雒邑在政治空间上的历史传承关系。对于被周人驱使来修筑雒邑的商遗民来说，王朝兴替的历史仿佛在这个已经沉寂几个世纪的盆地重演。

（二）晋南夏墟

晋南盆地的历史山川为探究龙山传统与周代政治之间的关系架设了桥梁。《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卫国的祝佗通过追述周天子把三位诸侯分封到卫、鲁、唐三地时颁布的册命来论述政德与辈分在礼制中的轻重。叔虞封地在夏墟故地，册命要求他以夏的政治传统和戎狄的法令治理高地臣民、测量土地、征收贡赋：“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段历史追述显示，周天子用山川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点作为建立军事据点和政治秩序的坐标。

周人的历史空间叙事，以及用古地名与政权命名器物的做法，促使我们关注古人讲述故事的特定方式、道具、与场景，以及关于特定地点、文物、与族群的记忆形成的过程。周人对晋南盆地历史传统的重视，传达出占领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册封唐叔时周天子赏赐的

镇国重器，特别是与周人克商事迹有关的阅兵车辆、鼓乐、与战甲，强调周人的军事威严；另一方面，分封叙事中提及的唐与夏的历史遗产承认了当地高地部族所继承的古代政治传统的正当性。在周代文献追述中，出现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唐，是夏王朝之前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周代到西汉的数百年中，关于唐、虞、夏等早期政权领袖的传说，逐渐被列编成一套系统有序的圣王名单，频繁出现在传世文献中。晋南盆地是这些传说中圣王故事发生的政治舞台。《水经注》描述的汉代尧庙，就座落在临汾尧都区南郊下靳附近。因此，在陶寺遗址发现之初，李民就提出陶寺与这些传说政权唐的联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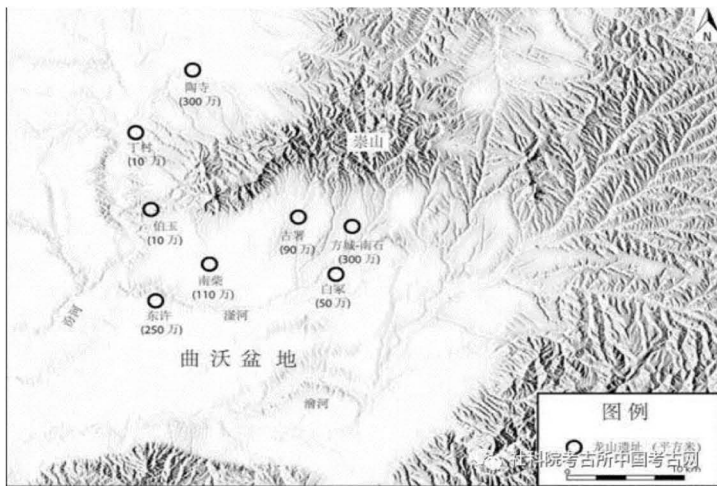
浚县辛村与曲阜鲁故城的发现为卫国与鲁国封地提供了考古证据，而崇山南麓的天马—曲村西周遗址与晋侯墓地的发现，则为晋国早期的政治中心、以及有关唐与夏墟的传说地理之间建立起时空联系。从崇山四周考古遗址的分布情况可见，座落于曲村的早期晋国都邑，为龙山时代的一些最庞大的遗址所环绕，而这里没有二里头到殷商时代的大型聚落（图三）^②。这些发现展现了晋南深厚的社会记忆与丰富的考古遗存之间的高度契合。在晋国建国叙事中提及的唐与夏墟，其历史原型很可能来自一千年前的陶寺及晋南大型龙山聚落群。

曲村的发现证实周人通过封土建国重建晋南夏墟社会的做法。同时，大河口霸国墓地、横水偃国墓地的发现则揭示了曲村周围高地部族的

^①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

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博物馆：《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图三 晋南曲沃盆地内考古遗址分布图(李昊 绘制)

遗迹。这些贵族墓地可能属于随周人迁入晋南而重返故地的高地盟友,也可能是《左传》里晋国封建叙事中封给叔虞的高地部族“怀姓九宗”——殷商时代晋陕高原鬼方集团的后裔^①。过去的传说是这些高地部族重要的政治资源。虽然传世文献并未言明这些高地部族与夏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但《左传》封唐叙事中“启以夏政”的说法显示这些周人试图控制的高地部族视夏传统为重要历史遗产。这些考古发现支持《国语》对晋南盆地政治格局的描述,即“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这些高地部族聚落环绕着几个周人重要据点,共同占据着这个拥有复杂历史背景的地区。

文献中零星记载这些高地部族对晋南历史遗产的继承——范氏追溯远祖为陶唐,先轸则可能是晚商先族的后人。墓葬传统也揭示出他们与周人的文化差别,晋侯墓地采用的是商周贵族常

用的双墓道或单墓道大墓,但放弃了商墓使用腰坑的习俗。而曲村以东廿公里的大河口墓地却采用了高地龙山社会与商周的混合传统。霸伯墓墓室四壁上开设十一个壁龛的做法在周代之前仅见于龙山时代的陶寺中期大墓M22,可能是黄土高原窑洞居住传统的礼制化延伸。墓室二层台和腰坑则是商墓常见的做法,主要青铜器组合也与商周贵族基本相同。晋南之外,这种壁龛墓室在西周只在宝鸡石鼓山贵

族墓地发现过,其墓主属于与周人联盟的高地贵族^②。这些贵族墓葬传统,反映了龙山传统在高地社会礼仪中的延续。

大河口墓地墓葬结构与随葬物品显示霸伯和他的贵族们非常了解商周贵族礼制传统。大河口与曲村相邻,物质文化也显示双方多有往来。在晋国近畿展现与晋侯墓地如此不同的礼制文化显然是精心的选择——在有各地贵族参加的隆重葬礼活动中,通过采用当地的古代礼制传统来昭示高地贵族对晋南祖先故地的历史追忆。

墓葬布局之外,晋南社会与过去的联系也体现在传世器物之中。曲村第二代晋侯燹父配偶(M113)墓中所出土的青铜绳纹双耳罐,造型与一千年前陶寺出土的彩绘陶双耳罐十分相似,可能是仿古铜器或是传世龙山古物。陈芳妹指出,这件高地龙山风格的青铜双耳罐可能是作为高

^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文化旅游局、上海博物

馆:《周野鹿鸣——宝鸡西周石鼓山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地贵族女性的嫁妆被带到曲村^①。从物质文化角度来看,龙山社会双耳罐空间分布东到太行,西到甘青。除了曲村 M113 墓的发现之外,双耳罐没有进入中原青铜礼器传统。青铜双耳罐与商周青铜礼器一同随葬在晋侯墓地体现了当地贵族保持了高地龙山传统的社会记忆,器物造型的延续性也证明墓葬礼制上体现的差异并非偶然。它的作用如同叔虞封唐时从周天子分得的镇国重器——代表着晋南高地部族的传世古物与唐和夏墟的故事一起传承,而晋侯与高地贵族的联姻有助于巩固周人在晋南的统治。

大河口贵族墓葬出土的大宗货贝显示这些高地部族在跨越欧亚草原的货贝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草原社会的西端,这个时期东欧斯基泰人遗址中也大量出现货贝^②。这两个东西呼应的货贝贸易网络的共源应该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沿岸,即珀赛所提出的连接东南亚与中亚的亚洲中部互动圈之内。正是由于这个草原交换网络的成熟,使得远离海滨的周王室与贵族得以在封赏与交换活动中大量使用货贝。这些现象支持《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高地社会“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的描述。

以上考古证据显示,这些高地部族与高地龙山社会有渊源关系,并且参与西周社会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换。虽然大部分人口可能在晚商之前离开晋南盆地,但他们保持了高地龙山故土的社会记忆。通过征服定居于黄土高原的高地部族,

并在重返夏墟的旗号之下把他们迁回到晋南,周人使得晚商以来已经人烟稀少的晋南盆地重现生机,并因此改变了周王朝中空的空间格局。

这些高地部族在融入晋国之前不仅与周人关系友好,而且积极参与周人的政治事务。周人控制之外的高地部族则与晋国及其他诸侯国进行军事与政治角力。在晋南周边,精通冶炼的狄人掌握着中条山铜矿。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晋南盆地聚落分布特征所反映的政治格局,以及文献描述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族群分布的情况基本吻合。陶寺、石峁这些高地龙山都邑寓于山川、礼仪和器物中的社会记忆,定义了高地部族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并在周人政治秩序之下存续。

(三)层迭书写的夏文明传统

在周代文献追述中,兴起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的夏是王朝政治的开端。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可能与龙山时代的一系列政治实验有关。因此,龙山遗产作为一个传说时代向三代王朝的转折,为周人提供了想象过去的基石。同时,考古材料也帮助揭示古代社会为达政治目的,如何改写过去的历史。

周人文献中,夏朝史迹的核心地区是晋南与伊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对魏国历史地理的描述涵盖这两处夏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

^①陈芳妹:《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陈芳妹:《商周稀有青铜器类的文化意涵——所谓边缘文化研究的意义》,《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5年第19期。

^② Bruyako, gor V., Seashells and Nomads of the Steppes (Early Scythian Culture Molluscs of the Cyprea family in Eastern Europe).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007,13:225—240.

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作为《左传》的早期传承者，吴起所描述的历史空间格局与前述周人建国叙事的时空框架基本一致。晋南、洛阳两盆地也是聚落考古所见，公元前三千纪末到二千纪前半政治发展的核心区域。但是，相对于杏花—下七垣—二里岗—殷墟陶鬲传统的一脉相承，晋南、伊洛两盆地陶器传统差别显著：晋南主要炊器是源自黄土高原河谷的空三足鬲和甗，而伊洛、颍水河谷则是源自淮河流域裴李岗传统的实足鼎。两地陶器群的差异对夏文化的单一性形成挑战，并揭示出周人的晋南、伊洛夏史传说可能拼合了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前半不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这并不是说商人或周人凭空发明了夏朝的传说——为达政治目的而改写、创造社会记忆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王朝叙事的做法可能在二里头政权形成前后已经开始，并持续发生。

从公元前十八、九世纪的二里头回溯陶寺、石峁建城之初的事迹，已经是四、五百年前的传说。然而，龙山时代的遗产对二里头文明的形成有核心贡献。如前所述，二里头都邑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其中，青铜冶铸、绿松石镶嵌、贝冑、牙璋等源自高地龙山社会的文化因素不仅成为二里头贵族文化的代表，更是成为三代文明的象征。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承，可能伴随着

二里头政权对高地龙山政治遗产的声索。考古证据显示嵩山南麓的王城岗龙山城址与陶寺、石峁中晚期都邑都已经进入传统文献中的夏纪年早期。随着二里头的兴起，嵩山周边王城岗、新砦、花地嘴等地所发生的故事也汇入其政治史，形成以晋南与伊洛两地为轴心的夏史传说。其中，嵩山南麓的王城岗龙山城址与陶寺、石峁中晚期都邑都已经进入传统文献中的夏纪年早期。

二里头政权的建国叙事，可能从文献中少康中兴事件一窥端倪。传说夏朝早期，淮河流域的有穷后羿势力入侵，导致夏朝国祚中断近一个世纪，直到少康复国。传世文献中关于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的说法都把这个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放在洛阳盆地。倪德卫曾根据文献纪年推算，少康中兴叙事背景是公元前十九世纪后半的早期社会^①。今天的考古测年显示这大致是龙山社会崩溃，洛阳盆地内外新砦和花地嘴陆续兴盛，以及二里头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田昌五、李伯谦先后提倡的二里头为少康复国之夏，符合当今所知的考古时空架构^②。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曾经在国祚中断百年后成功复辟。如果我们不去追究少康传说的历史性，而把这个历时近百年的复国故事当作一个新兴政权的建国叙事，那么这个复兴夏祚的努力就是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治传统的开端——许多政权以夏为号，昭示其历史正当性。值得注意的是，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王朝“自禹至

^①Nivison, David S., The Key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Three Dynasties. The Modern Text Bamboo Annals. In Victor H. Mair ed: Sino-Platonic Pape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9, 93:1-68.

^②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2年第5期；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按照年代推算,少康之前的叙事可能存在许多空白。少康之后的夏王名表,与之前相比,更加详细,表明公元前三千纪末的政治与宗教发展与公元前十九世纪之后的政治轨迹不一定连贯。因此,龙山社会崩溃之后重新整合、兴起的二里头政权可能没有声称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是在声称继承高地龙山遗产的同时,开启了洛阳中心的中原政治秩序和以铜鼎为政治与宗教权威象征的文化传统。

在后代政治势力的介入与操控下形成的夏史传说,好比经过反复书写的古希腊羊皮纸写本(Palimpsest),积累了不同时代的痕迹。如前所述,作为源出高地的政治势力,周人关于过去千年的历史知识的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为二里头与商的中原政治传统,为微史家族这种王室世袭史官所传承,一为在中原王朝周边平行发展的高地政治传统,为羌人、戎狄等高地记忆群体所承载。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让周人可以依其不同的需求,诠释有关夏王朝的历史遗产。这种灵活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来自关中的周人,何以能在三代历史的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相对持久的政治秩序与文明观。

周天子的权势衰落后,各地诸侯可以利用不同版本的历史传说,来支持其政权的正当性。但是,周代社会中共享的历史传统也约束着篡改历史的空间。《左传》中魏绛、祝佗、子产等人可以视为本雅明所谓“讲故事的人”^①。他们善于通过讲述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来支持他们的政见,而他们对贵族世系、历史地理、传世文物等细节的精确描述使他们的故事与主张令人信服。这些

故事所维系的正是文化的层面上,周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

传习典籍之外,对前朝遗民和历史场景的寻访,是当时获得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见郯子的故事,讲述了传说时代东方少昊职官制度。传说时代的片段记忆,成为建构政治理想的知识前提。作为殷人后裔的孔子,在比较三代历史传统的前提下作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选择。而《论语》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的记述,则体现出当时对古代社会记忆流失之自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季札听到唐风时用赞叹的语气表达了对传说时代的追念:“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这种音乐评论与《诗经》等典籍中的历史时空紧密相联。

《左传·襄公四年》魏绛以少康复国的传说告诫晋侯勿好征伐,并传颂以“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开篇的虞人之箴为戒。三家分晋之后,魏绛后人以他的封地安邑为中心建立魏国,占据晋南腹地。《战国策》载公元前344年魏惠王曾经在商鞅的怂恿下自称夏王。根据考古所见公元前三千纪以降晋南政治格局的历史沿革来看,魏国有关晋南夏地的说法,源自晋立国于夏墟的政治遗产,而非战国时代的发明。

如果我们认为商周政权创造了过去的历史,那么必须假定商朝之前的社会记忆与政治遗产被完全遗忘或严重扭曲。然而,我们根据考古证据分析唐、夏故地的政治空间格局,会发现这个前提无法成立。晋南与洛阳盆地均位于殷商势力的边缘地带。商人没有能力与机制将其创造

^①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Schocken Books, 1968.

的历史神话强加给那些从未被彻底纳入商人政治与宗教体系之内的高地族群。后起于关中盆地的周人也不可能为商人创造的历史神话背书。

虽然殷商时代距离龙山时代已历时千年,祖先的事迹与世系是古代贵族社会的基石。高地龙山到二里头社会的政治遗产是周人与其高地盟友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周人不需要从一个历史的真空中发明一个早于商王朝的强大政权——过去的知识仍在山川形胜、典籍文物、传说故事中延续。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知识为基础,营建其以王朝兴替为前提的天命观。

周人以伊洛与晋南为正统的三代政治空间格局有助于巩固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整合,但这种空间理想也导致关中盆地始终孤悬于三代文明空间的边缘,为高地社会所包围,并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和关中的沦陷^①。周原青铜器窖藏的发现显示出这个变故对关中历史传统传承的破坏——随着周人祖先之地的沦陷,许多凭借宗庙陈列与铭文重器承载的社会记忆因此失散。然而,作为周文明的核心内容,早期经典与王朝的历史通过贵族教育在东周社会中传承,成为诸子哲学传统的知识前提。

四、禹迹:想象的文明空间

“禹迹”——传说中夏禹主导治水所踏查过的地域——是一个广义的、周代邦国之间共享的文明概念。禹迹的观念在《尚书》、《诗经》等早期

传世文献、西周夔公盃和东周秦公簋等青铜器铭文中都有涉及。其中《尚书·禹贡》篇是传颂大禹最具影响力的传世文献。它清楚地定义了禹迹世界的范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一个需要步行历时数月才能横跨的地理空间。在这个想象的文明空间中,《禹贡》的核心使命——导山导水、划分州域、描述地理、土壤分类、田地定级、列举纳贡的物品和路线等内容都凸显出宗教权威与政治理想的紧密结合。

二十世纪早期开始,学者对《禹贡》成文年代的看法开始出现分野。王国维、沙畹、葛兰言等学者认为《禹贡》在西周已经成型^②。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史学家则认为它是战国晚期大一统思想的作品。虽然学者们对《禹贡》的创作背景与时代看法不同,双方的共识是大禹传说来自古代宗教传统。由于这些论述都是在中国考古学发轫之时提出,双方都认为未来的考古学会提供答案。葛兰言甚至预言,在孔子时代之前,尚有几个更早的中国文明,等待考古发掘去发现。

考古学为我们考察《尚书》等早期经典的形成过程和社会背景提供了一个大幅度拓展的时空框架和知识基础。李零指出:“把‘禹迹’当作中国早期地理知识、地理观念的一种拼凑版,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相当古老的思想。”^③那么,这个古典文明的核心观念出自什么政治和宗教传统?西周社会继承还是建构了这套空间理

^①Li Feng, *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Chavannes, Edouard, *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Leroux, 1910; Granet, Marcel, *Remarques sur le Taois me Ancien*. AsiaMajor, 1925, 2:146-151.

^③李零:《禹迹——〈禹贡〉讲授提纲》,《中国文化》2014年第1期。

想?《禹贡》的作者们在何种知识前提之上完成对地理知识的拼凑?

邵望平通过对海岱地区史前考古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首次将对《禹贡》知识谱系的考察放在文献时代之前的时空框架中。她指出《禹贡》空间界分与贡物描述中,保留了大量龙山时代的讯息,九州观念的存在与变迁是战国诸雄分野的历史前提和依据^①。本文对早期中国空间结构特征与技术知识的分析,支持邵望平以龙山时代为《禹贡》地理知识形成背景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禹贡》宗教传统源自龙山社会对严重自然灾变的宗教回应。这个宗教传统成为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探究它的兴起与传承对于理解经典的发生十分重要。以下从文字风格、空间结构、知识前提三个方面来讨论《禹贡》形成年代与地理观念来源。

首先,文本风格和发展脉络显示禹迹和九州观念在公元前一千纪前半叶已经广为流传。《禹贡》文本中“厥……惟……”句式接近西周金文,在《春秋》等东周著作中已经不再使用。相较之下,《周礼》、《逸周书》、《墨子》、上博简《容成氏》、《吕氏春秋》、《尔雅》等文献中的九州叙事,是一个由繁入简的传承过程。不同版本之间,九州空间分类略有不同,表明在东周应该已经有诸多传承脉络。但是各先秦版本中,禹迹空间基本轮廓与规模差别不大,只是内容也越来越简洁和程式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尚书·禹贡》是传世和出土涉及九州的先秦文献中文字风格最早的一个版本,在《墨子》、《容成氏》出现之前已经成型。

其次,《禹贡》建构的晋南中心格局与我们从考古角度所了解的商周政治空间结构显著不同。《禹贡》将黄河中下游河道三面环绕的冀州视为九州天下的核心,所有贡道最终通过黄河抵达冀州西南角的帝都。在传世文献中,这种以冀州为首的空间结构是与位于晋南盆地的唐和夏墟传说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左传·哀公六年》引当时流传的《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龙山时代之后相继兴起的洛阳、郑州、安阳、周原、丰镐等政治中心,分别置于豫州、冀州东缘、和雍州等外围地带。从考古学视角来看,晋南中心格局的前提是龙山时代的社会记忆。对周王朝的创建者来说,这种理念已经是一种过去的政治空间蓝图。然而,正是这份与传说时代夏墟相连的政治遗产,使周人得以重建殷墟时代已经人烟稀少的晋南社会。

最后,《禹贡》地理知识与物质文化特征与龙山时代矿冶知识的拓展有关。《禹贡》对贡物的综合描述,反映的是一个具有多金属矿冶知识,但青铜冶金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物产描述所涉及的多金属矿藏知识在欧亚冶金传统中具有整体性和久远的历史,并与畜牧一起出现于龙山时代的中国社会。《禹贡》对金属矿藏描述最详细的梁州是以岷山为中心的空间定义,与后代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视角有显著不同,但与聚落考古所见公元前三千纪岷山河谷聚落发展早于四川盆地的特征一致。自公元前四千纪的庙底沟时代起,川西高原就通过黄河、洮河、白龙江、岷江等河谷与黄河中上游高地社会存在往来^②。对西城驿、宗

^①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说中国文明的多源性》,《九州学刊》1987年第2期。

^②陈苇:《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科学出版社,2012年。

日、火烧沟、磨沟等史前遗址的发掘显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到二千纪中,岷山北麓、西麓河谷到河西走廊一带是高地龙山社会与草原畜牧人口交汇之处,也是早期多金属冶炼最活跃的地区^①。

通过对比龙山和三代政治格局我们可以看到,龙山时代甘青、川西与晋南、陕北的往来规模与紧密程度都要超过三代社会。这里也是《禹贡》所记雍梁贡道的所在(图四)。《禹贡》以为河源在积石山(青海的阿尼玛卿山),雍州贡道从河源出发沿黄河上游北行“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经甘肃、宁夏、内蒙,穿山陕二省间,到达龙门西河,最后抵达黄河与渭水交会之处。贡物是球琳、织皮等。梁州贡道从西倾山(今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出发,沿白龙江(源出四川若尔盖县的郎木寺镇,古人称为桓水,认为源于西倾山)东南下穿越岷山,在四川广元入嘉陵江之后溯江北上,走陆路进入陕西宁强的汉水(沔水)上



图四 雍梁贡道示意图

游,沿江东行,从汉中盆地走陆路翻越秦岭进入雍州的关中盆地,沿渭水东行,在潼关东渡冀州西界龙门西河到达晋南。贡物是铁、银、倮、罽、磬、熊、罴、狐、狸织皮等^②。作为雍、梁二州贡道源头的积石、西倾二山相距不远,都是龙山时代齐家文化遗址分布密集的区域(图四)。对西北雍州人贡美石的描述,也与高地龙山社会大量出现绿松石与墨玉的考古特征一致。这些地区后来从未被纳入中原王朝的政治空间范畴。对冶铁高度业发达的战国社会来说,人们对《禹贡》中从遥远的西倾山穿越岷山、汉中、渭水、黄河向晋南输入兽皮、铁、银与制作箭头用的石等物品的描述非常陌生。

与《禹贡》地理观念来源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它的成因。本文认为公元前三千纪晚期长达数百年的气候异动,对大禹治水传说的形成有核心贡献。干旱与洪水叙事是各国神话故事中的常见题材,不需要对应真实的气候史事件。然而,虽然政见不

同,先秦诸子都把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作为洪水灾变发生的具体时间范畴。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种共识只能来自当时共享的社会记忆,而非某个学派为支持其立场而发明的主张。

气候异常引起的持续干旱并间以数度逆转是发生大规模地质灾害的重要条件之一。频繁的灾变会导致传统宗教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崩坏,并催生新的宗教势力与政权。在这类因应环境异常出现的新兴宗教中,用仪式和

①陈建立、毛瑞林、王辉、陈洪海、谢焱、钱耀鹏:《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年第8期。

②李零:《禹迹——〈禹贡〉讲授提纲》,《中国文化》2014年第1期。

献祭来祈求超自然力的介入是其宗教诉求的主要内容。如果从水利工程学诠释转向宗教人类学解读,以大禹为中心的宗教传统以及他平治洪水的传说,大概源自龙山社会对严重自然灾变的宗教回应。除山川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之外,在传统社会秩序崩坏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宗教网络还可能包括以应对危机为号召的社会动员。

这种新兴传统以宗教仪式来控制自然之力,因此常在神迹彰显之处举行,例如瀑布激流、两河交汇、水流穿山之处等山川形胜。这些举行召唤仪式的地方都可以视为大禹曾经亲顾之所。晋南的壶口、禹门口、砥柱,洛阳盆地的洛汭、伊阙,淮河流域的涂山,岷江口的龙门山,甘青积石山等地都具备这种地貌结构,是山川祭祀的理想场景,后世传说也多与禹迹相连。例如,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于南美安地斯文明中。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带来的灾难性气候,打破传统宗教秩序并催生新兴宗教迅速传布。与殷周大致同时的查文宗教建筑群故意建在两河交汇处一个地质极不稳定的河谷,并在建筑群下模仿周围水系营造水道网络,形成宗教沟通与神圣山川的交迭^①。为宗教建筑特别设计的扩音效果,显示声

音在宗教体验中的重要作用^②。

在选址之外,表演性是这个宗教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古史辨》出版的同时,葛兰言从宗教人类学角度指出《禹贡》可能是中国古代雩祭禹步表演时念唱的颂辞。巫祝用不同空间象征九州,边走边念,行步转折,通过象征性地巡游九州空间来召唤神力,使得山川、神性、与身体技艺合为一体。后世以儒家为代表的王权九州政治传统和以道家禹步为代表的方术传统正是从这个史前萨满教的仪式发展分化而来^③。雩祭禹步表演,可能接近这一史前宗教传统的早期型态。

李零对《禹贡》空间叙事顺序的分析支持葛兰言的观察。李零指出《禹贡》以晋南盆地西侧的龙门西河为中心,采用横8字形双回环叙事顺序,把大禹治水的巡游路线分为两个圈,分别贯穿东方低地六州和西方高地二州^④。这种在贡路辐辏格局之外的双回环空间安排更强调文本的表演性。《禹贡》作为宗教文本的传奇之处在于它对地理空间扼要而精确的描述,使传诵者能通过对局部区域的亲身体验,想象整个禹迹世界的秩序架构与治水事业的宏大规模。真实的山川知识细节和对常人空间认知规模的突破,唤起的是对大禹超自然力的敬畏。

由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也是早期王权和三代政治传统的形成期,气候与社会剧变背景下形成

^①Kembel, Silvia Rodriguez and John W. Rick Building authority at Chavin de Huantar: 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itial Period and Early Horizon. In Helaine Silverman ed: Andean Archaeology. Blackwell 2004, pp.51-76.

^②Moore, Jerry,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he Ancient An-

des.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05.

^③Granet, Marcel, Danses et legends de la Chine ancienne. Le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6, p.258.

^④李零:《禹迹——〈禹贡〉讲授提纲》,《中国文化》2014年第1期。

与传播的宗教传统具有强大的政治潜力,导致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密不可分。夏禹传说中,治水赋予王权正当性,而治水所积累的地理知识成为营建新政治秩序的前提。这种王权观念的形成,为政治实验提供蓝图,使得“声教讫于四海”成为建立早期国家的政治抱负。在龙山时代这个群雄并起的时期,对这种宗教力量的主张与声索可能是夏启建国叙事中王权观念的重要来源。

玛雅文明关于羽蛇之神魁札尔科亚特尔与圣城图拉的传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夏禹传说中早期城市、王权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联^①。羽蛇的人、神、物多重化身,以羽蛇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网络,各处声称曾被羽蛇造访过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中自称是羽蛇子孙的领主,以及数百年来各政权不断重建羽蛇圣城图拉的努力,均与周人描绘禹建立夏朝的神话和各地声称禹都的情况相似。传说中的禹会,可能源自该宗教网络以禹的名义举行的大规模聚集和仪式活动。所谓禹都,可以视为声称继承大禹宗教传统的龙山城邦。二里头祭祀区中的土丘,以及踩踏面层层堆叠的埧形遗迹,或为这类雩祭禹步表演的场所。而在踩踏面之间埋葬的佩戴的绿松石镶嵌铜牌和铜铃的死者,则可能是雩祭者与他们生前使用的道具。

通观从公元前三千纪到一千纪的政治格局与物质文化变化,以晋南为中心的龙山社会为《禹贡》天下观提供了想象与整合地理知识的框架。其核心内容包括以龙山时代新兴的以山川祭祀为核心的宗教网络、与早期王权观念伴生的政治空间理想、以及以多金属矿藏知识为前提的山

川观念。这一套山川表述的系统性,显示《禹贡》九州空间观念的建构并非简单的知识拼凑,而可能是在一个宗教与政治理想指导之下,对具有相当规模的实地考察所获得的地理知识进行的汇总与概括。

这种知识的本质是控制,首先是在宗教意义上对超自然神力的左右,随后衍生出政治意义上对资源与山川的声索,两者紧密相联。所谓州域,是对文明空间的系统认知与基本界分,并非行政区划和郡县。以两河之间来描述和界定地理空间的做法,在西亚、南亚、中亚都曾普遍存在,与中央集权和领土国家没有必然关联。正如邵望平所指出,这种系统的认知与分野,为帝国的出现提供想象的蓝图。

综上所述,《禹贡》文本是一份宗教篇章,也是一份对政治空间蓝图的系统表述。它阐述的是一种辐凑结构的王权理想——政治秩序应当如此,而非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描述。这种王者的知识,一直在被传颂、书写、修改。即使晋南盆地的龙山都邑没落数百年,其晋南中心的空间格局仍在经典传统中保持持久的影响力。

这些传说时代的宗教遗产给各地诸侯提供了表达与想象空间秩序的框架。在淮河流域,涂山北麓春秋钟离国君柏墓中仪式空间的布局与涂山南麓龙山时代禹会遗址所定义的神圣山川遥相呼应。柏墓封土与墓坑都使用五色土填埋,墓室之上覆盖玉璧形白土层,其下二十条用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的放射线迹象,以一定角度规律从中央向外辐射,其西南方向正对隔淮河相望的

^①Field, V. M., J. M. D. Pohl, and V. I. Lyall (ed.), *Children of the Plumed Serpent: The Legacy of Quetzalcoatl in Ancient Mexico*.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2012.

涂山与荆山。再下面十八个五色土堆筑土丘(埤)象征天之九野,与地之九州的总和^①。土丘周围一千多个泥偶以及其下三四层土偶垒砌成的土偶墙共同表现出一个宏大的场景。这种墓葬布局对九州山川的表达,对五色土的反复使用,以及与荆涂二山呼应,共同显示“禹会涂山”的传说可能为淮河流域贵族营造其仪式空间提供了脚本。

前述证据显示,唐、夏墟、禹迹、九州等概念在《诗经》、《左传》等典籍形成之前已经是周文明的基石,并非魏国所独创。从诸子的作品和《战国策》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对经典传统失去敬意的时代,但不是一个经典发生的时代。《墨子·兼爱》中用高度程式化的语言描述传说时代的事迹,表达作者对经典知识的把握,然后马上强调那都是古代圣王的办法,“吾今行兼矣”。上博简《容成氏》显示出同样的趋势。

物质文化遗产也支持龙山传统对三代文明的深远影响。《禹贡》结尾,为犒赏平治洪水的丰功伟业,帝赐禹玄圭,这是周代文献中叙述夏朝肇建史迹的主题。玉圭在山川祭祀中的使用,在传世文献时有提及。例如,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使用玉圭的其他场景也都涉及政治权威与宗教沟通——觐见周王时,诸侯献上玉圭、玉璋以表示对天子的敬意;诸侯出行时,将玉圭装在仪仗的顶端为仪仗;

诸侯在参加祭祀与盟誓仪式时,将祷辞写于玉圭上等等^②。

从考古学证据来看,龙山宗教传统中形成的山川祭祀仪式和玉制祭器是周人仪式用玉制度的主要源泉。黑、白玉圭在陶寺都有发现。石峁遗址中大量使用墨玉和青玉玉器来定义神圣空间的做法,以及出土玉器的造型特点,包括牙璋、玉圭、玉钺等,都与周文明用玉传统相连。《周礼》六玉的玉器雏型在石峁集中出现,说明古代中国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在高地龙山传统中经历了一次重要整合。在晋都新田祭祀遗址的发现显示,当时祭祀仪式使用的玉器包括细线阴刻着鹰形图案的龙山玉圭,经过改制的龙山牙璋,以及大量新制的玉圭、石圭。^③

从龙山时代开始,玉牙璋在古代中国广为流传,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半岛、洛阳盆地、商洛走廊、湖南、四川、远至南海之滨,分布范围超过三代早期青铜礼器的分布和政权疆域^④。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这种龙山时代的遗产不仅在殷商政治势力无法控制的高地社会传承,而且安阳所发现使用牙璋族徽的玉工墓葬显示具有龙山、二里头琢玉技术传统的家族在殷墟服务于王朝的贵族经济^⑤。这些匠人家族在商王朝被征服之后被迁入周人的都邑之后,用他们世袭的琢玉技能服务于新王朝,这种知识与技艺的传承使得周代贵

①冯时:《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鍾离君柏墓解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第3分,2011年。

②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③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

社,197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西高东周祭祀遗址》,《文物》2003年第8期。

④邓聪、栾丰实、王强:《东亚最早的牙璋——山东龙山式牙璋初论》,《玉润东方》,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铁三路89号墓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3期。

族可以了解到这些古玉造型的宗教内涵。

二里头和商王朝之外,考古证据揭示龙山宗教传统在高地记忆群体间的传承。在三星堆和金沙,良渚和龙山造型的玉器与商代铜尊、铜像、金制品、货贝、象牙等其他贵重物品一起被埋藏在朝向岷山的祭祀遗迹中。有的玉牙璋上用浮雕表现了紧握牙璋的跪立者和山丘近旁插着牙璋的山川祭祀场景。虽然时间上与龙山时代相差近千年,通过礼器的组合与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龙山和二里头宗教仪式在这些高地记忆群体中的传承。

成都平原是岷江出岷山后漫流之处,地形与黄河从黄土高原进入晋南盆地的禹门口相似。岷江上游峡谷险峻,地质结构极不稳定,滑坡堰塞河道后形成悬湖,水位逐渐升高一直到在重力之下崩塌,使下游平原遭受洪水威胁。如果龙山时代出现因应灾难性的气候剧变而兴起的宗教网络,川西高原河谷和成都平原之间应是举行山川祭祀的热点区域。《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这里举行的山川祭祀:“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湫。”这些地貌特征和祭祀方法都与前述山川传统相同。

蜀人本地神话之外,汉晋以来四川亦流行大禹汶川之会的传说。传说地理中禹出生地的汶川、北川、青川三地都座落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如果我们把文献中大禹兴于西羌的说法,理解为当地社会对高地龙山社会的宗教遗产有所传承,那么当地禹生石纽的传说与中原各地的禹迹叙事应是平行传承的文化传统。与前述羽蛇的传说一样,都是跨区域宗教网络的遗产。

《禹贡》中对岷山河谷的地理描述,体现出对

川西高原地貌的充分了解,这与商周时代形成的中原与高地政治对立格局有显著不同。而这些现象如果放在前述从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的高地轴线之上,就可以理解高地龙山社会与三星堆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与二里头和殷商并行的一个知识传统。这些地方共享的禹神话可能是周人与其他高地传统共同继承的龙山时代宗教遗产,在华夏边缘的高地社会中通过口述与仪式传承。随着关中盆地的沦陷和周王室的东迁,周原作为不同历史传统交汇中心的地位被打破,川西高原与中原的阻隔逐渐扩大,导致后代的中原社会难以理解这种曾经存在的联系——这个变故对于理解先秦典籍中地理知识的来源与传承十分重要。

结论

考古研究显示,自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开始的龙山时代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波澜壮阔的转折期。气候灾变、跨区域互动扩大、矿冶活动发端、王权都邑出现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伴随着以良渚、石家河为代表的传统宗教权威与政治秩序的崩坏,新兴的宗教网络以自然灾变为背景,融合不同来源的宗教仪式与物质文化,发展成具有统摄特征的宗教传统。它与早期中国青铜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相始终,并成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宗教知识的一个重要源头。大禹治水的传说可能就是来自这个宗教传统。九州观念的存在与变迁不但为帝国空间政治传统的形成勾勒出蓝图,秦皇汉武巡狩封禅的范围与路线也都着追寻大禹行迹。同时,道教传统中的禹步仍然保持了“8”字型双回环姿势,通过对禹迹九州象征性的巡游来召唤蕴藏在神话山川中的宗教力量。

即使我们把“夏”理解为“古雅、文明”这些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某个政权或族群，周人之“夏”仍有相当明确的时空范畴。考古所见晋南与洛阳两盆地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所经历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变革，可能为古典传统中我们所熟知的唐、夏故事提供了素材。关于这些地方的历史记忆靠对祖先之地的传说来承载，以丘、墟、和山川形胜为坐标。关于这个时代的传说，成为先秦中国对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核心表述。宗教传统之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一些知识、造型、器物、与技术，陆续被纳入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些包括由青铜编钟与石磬所组合而成的乐器配置、铜玉礼器、以货贝为标准的价值体系等。它们的雏形在陶寺等龙山都邑出现之后，历经千年的演变，通过二里头、郑州、殷墟的传承，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早期中国对历史叙事的政治性重建，伴随着一个遗忘的过程。那些曾经广为流传的、龙山时代之前的政治与宗教传统，经过龙山时代前后的几度变迁，成为零散、扭曲、甚至是消失的社会记忆。这种变化，在文献典籍方面早有体现。《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只有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之后，文献追述显示出社会记忆与聚落考古的逐渐契合。从西汉地理来看，陶寺、殷墟、雒邑分别位于河东、河内、河南三郡境内。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以冀州三河为框架描述早期中国历史空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的说法是一个基本准确的概括。

同时，通过考古学建构的文化谱系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二里头、商、周政权，只是龙山社会政治遗产的部分继承者，而且其知识来源和地缘政治又各不相同。自从二里头政权崛起于洛阳盆地起，高地与中原社会就出现分裂与对峙的趋势，并随着商与高地诸方的持续冲突而扩大。到周代，对立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源出高地社会的周人，在其建国叙事中强调中原文明的传承，视其余高地部族视为他者。

然而，高地龙山政治遗产的其他继承者有与中原并行的社会记忆与叙事传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秦诏用“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来描述帝国的四至。如果把北方大夏，以及《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的说法理解为长城内外的农牧社会对高地龙山社会的政治遗产有所传承与声索，那么司马迁的记述与我们通过考古观察到的周人与戎狄在“夏墟”之上展开的祖先政治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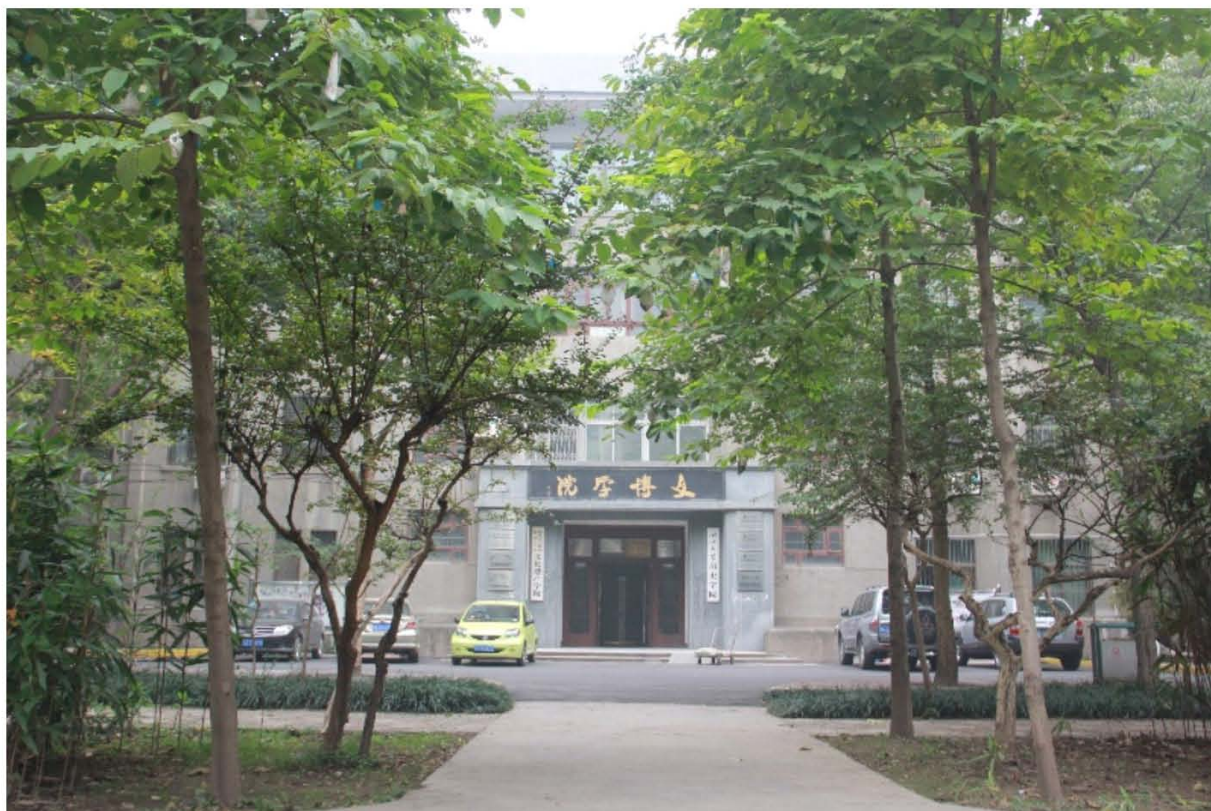
由于不同记忆群体和政治集团的存在，历史在各种叙述持续不断的竞争、协商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被反复书写。这些现象要求我们用一种更长的时间纵深来考察这些政治传统的渊源与变化。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史前与历史时代的分野，以及考古与文献间的区隔，把周人对传说时代的回溯，放在周人之前数千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之中，可以看到龙山时代政治和宗教遗产是三代文明社会记忆与经典发生的重要源泉。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成立于2010年。前身肇始于1937年建置的历史学系及1988年建立的文博学院。1939年,学校南迁汉中城固后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为文学院三系之一。1946年,历史学系随校迁至现址。历经80余年的发展,历史学院现已成为国内颇具实力的学术重镇。

新中国成立之前,陆懋德、萧一山、蓝文徵、黄文弼、周传儒、杨向奎等史学大家汇聚于此,使得西北大学历史学科名重一时,广受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侯外庐、马长寿、陈登原、史念

海、陈直等著名学者组建的学术团队,成果丰硕,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侯外庐提出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陈直“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的学术理念,马长寿以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史,都在各自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后,在张岂之、林剑鸣、周伟洲等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以中国思想史、秦汉史和民族史为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近年来,以陈峰、王善军为首的学术团队,围绕唐宋军政、辽金家族史等专题展开研究,在各自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以李利安为学科带头人的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在佛教史等



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

多年来,历史学科培养了众多高层次人才,不少人已成为中国史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尤以黄留珠、周天游、王子今、彭卫、魏道儒、王震中、杨圣敏、麻天祥等学者为代表。同时,本学科还培养了以王岐山为代表的领导人,从而推动了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目前,学院正紧紧围绕双一流的建设目标,开展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和提升为核心,以科研水平层次提升为抓手的重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学科平台稳步提升

历史学科历经时间的积淀,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平台。1962年,学科开始招收中国民族史方向研究生。1978年,中国古代史、专门史获国家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专门史获第二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1988年获批为国家重点学科。2005年,获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立一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1年,在历史学科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别获批为一级学科博士点。

学院下设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佛教研究所、古籍研究所、西安事变研究中心和以色列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现有“历史学”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设有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国学实验班)、世界史和国际政治等4个本科专业方向;拥有中国史和世界史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陕西省优势学科“中国史”和“世界史”,陕西省特色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及对外交流史研究”。2017年,“历史学”与“世界史”入选陕西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二、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历史学院自2010年创院以来,引进了一批

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及毕业于国内外知名历史院系的青年学者充实到教学与科研队伍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合理、学科领域完备的研究集体。学院现有专职教师41人(含外籍教师1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2人、讲师21人,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者达到100%。



陈峰教授201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入选陕西省教学名师、2018年入选陕西省“特支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王善军教授2014年入选陕西省“百人计划”,李军教授2018年入选陕西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7年入选陕西省普通高校杰出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入选西北大学“优秀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胡坤副教授2014年入选西北大学“优秀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张峰副教授2015年入选西北大学“优秀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裴成国副教授2016年入选西北大学“青年学术英才”,陈跃副教授2017年入选西北大学“青年学术英才”。

此外,学院现有教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一级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各1人,全国一级学会理事、常务理事7人。

三、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近三年来,学院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权威论文发表、学术专著出版和高层次科研获奖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1. 近三年来,学院于2015—2017年共获批

中国文化研究通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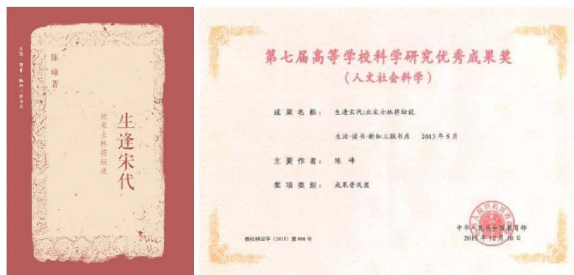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2 项,省部级项目 19 项。

2.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13 篇,核心论文百余篇,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期刊转载。

3. 在学术著作方面,学院教师先后出版了《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阳都集》等学术专著 21 部,尤其是 2016 年四卷本《西安通史》的出版,弥补了西安在大型通史著作领域的空白,对深入研究西安的历史文化和建设国际大都会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引领价值。此外,学院还定期编辑出版《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年刊。



4. 2015 年陈峰教授的《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一书荣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普及奖”。另外,三年间,学院教师的科研成果共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6 项,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8 项,陕西省统战理



论研究优秀成果奖 3 项,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 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 1 项。

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1. 为了提高西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学院先后通过“外国高端专家项目”,邀请哈佛大学入江昭、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韩国外国语大学金相范、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林冠群等国际知名学者来校讲学。2018 年 5 月,学院与英国利兹大学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提升我校历史专业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学院还与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等学术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2. 学院利用学校“侯外庐学术讲座”“西北大学名家讲坛”等高端平台,先后邀请了李伯重、耿云志、葛剑雄、陈其泰、阎步克、王子今、荣新江、

李华瑞、李剑鸣、欧阳哲生、阿利德·琼斯、加里·隆斯雷、陈时伟、吴淑惠等中外史学名家来院开讲；本学科的一批教师也先后受邀赴欧、美、俄、日、韩、中亚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双向交流与互动中，进一步密切了学院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

3. 举办多场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如承办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 2014 年度工作会议、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防”“中国古代军制改革”“当前中东局势及“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讨会”“‘区域视野下的中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纪念何炳棣先生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冉昭德文集出版座谈会”“纪念陈登原、陈直先生学术座谈会”“长安中国中古史沙龙”等多场学术会议，提升了学院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4. 2017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学院首次将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本科生联合举办的西安史学新潮论坛由西安之一隅扩展至全国范围，论坛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学术论文 126 篇，最终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近 20 所省内外高校的优秀本科生论文参会。



社科名家——彭树智



彭树智,男,汉族,1931年生,陕西泾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东南亚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担任过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1950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54年攻读北京大学亚洲史专业的研究生,1957年硕士毕业后回到西北大学工作。曾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和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并连任四届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理事兼任陕西分会副会长,陕西省史学会会长。1998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并任该馆馆员文史研究会会长。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内著名的中东史和世界现代史专家。

彭先生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科研课题,著述甚丰。其中先生自著的主要著作有

《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文明交往论》、《松榆斋百记》、《我的文明观》、《老学日历》;先生主编的著作主要有《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阿拉伯国家简史》、《阿富汗史》、《二十世纪中东史》、《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阿拉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13卷本)、《中东史》等。



先生在1986年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并荣获“人民教师奖章”,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2010年荣获“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荣誉称号。

先生长期从事中东南亚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在几十年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扎实的学术研究理论及深厚的学术研究领导能力,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与专项课题。

获奖项目主要有:《世界史教程》1989年获陕西成人高教优秀教材一等奖;《东方民族主义思



潮》于1995年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世界史》（六卷本）于1995年获第三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审定为“十五”国家级教材；《世界史·当代卷》1996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阿拉伯国家史》于2005年5月荣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和《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分别获陕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两斋文明自觉论笔记》（三卷）于2013年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陕西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荣誉奖。

在教学和教材方面彭先生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卓有成绩。在先生的带领下，西北大学于1986年在全国率先获得世界地区史、国别史（南亚中东史）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培养了众多的研究骨干，成为现代中东研究的主力军。

在教材方面，先生主编了本科教材《世界历史教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程（古代部分）》、《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程（中世纪部分）》、《世界近代史教程》和《世界现代史教程》（1992~1994年），以及配套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基本问题》、《世界近代史基本问题》教科书。在教育部规定的

全国性本科教材六卷本的《世界史》中，先生负责主编现代史卷的下册，并参加了近代史卷的编写工作，该书于1995年获第三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审定为“十五”国家级教材。在研究生教材方面，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东史》和《阿拉伯国家史》两部专著都被教育部审定为国家研究生教学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1和2002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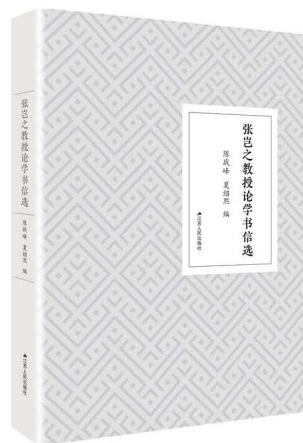
彭先生多年来在《西亚非洲》、《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和报道，引导着学术研究的方向。

彭先生在文明交往理论方面的研究引起国内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提出的“民族民主运动史”提法为教育部所采纳，取代了原有学科目录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史”。先生创建了中国的中东学科，带领中国中东史研究走向世界。

彭先生始终践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协作”的治学理念，主张将问题研究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将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结合起来，“芭蕉心尽展新技，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心德，长随新叶起新知（张之厚的《咏芭蕉诗》）。”虽已年愈花甲，先生仍笔耕不辍，坚守在科研的第一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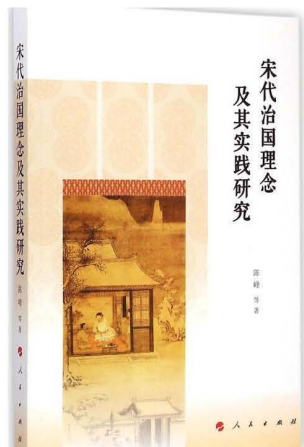
新书推介



◆《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陈峰教授等所著《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由人民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该书以治国理念及其实践为考察视角，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展演变的脉络之中审视宋代政治，全面总结并探讨了有宋一代治国理念的形成、发展及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调试，并深层次思考了其国家治乱兴衰的原因。书中不仅分析了赵宋王朝崇文抑武治国理念及重内轻外的路线在保障内部长期稳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效，同时也指出它的稳定与繁荣是以牺牲外部环境为代价，并最终在外族压迫之下灰飞烟灭的现实，其治国理念也是存在不足与缺憾的。



◆《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

《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陈战峰、夏绍熙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版。全书 27 万字，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是著名学者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及学者部分论学书信的结集。

《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是张岂之教授多年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经验的生动反映，书中以书信的方式与研究生商讨学术问题。

张岂之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培养博士生的经历，多次阐述了我国博士生培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宝贵经验，提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并不限于一流大学。即或不是一流大学，像西北大学这样的百年老校，在博士生教育方面也要有勇气、有毅力向一流方向行进。”他主张不断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的博士生教育体系。

该书出版对推进研究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有积极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本质、特征、基本规律与评价标准，探索建构中国式的全方位的博士生培养体系的经验与方式，努力促进和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